

The Economic Observer's Review of Books

书 评 增 刊

BOOKS

目录



P9 《公共利益》：四十个好年头（欧文·克里斯多夫=文）

《公共利益》创办人欧文·克里斯多夫回顾说，“过去的 40 年，我希望对于杂志的读者们，还有杂志的编辑和作者们，都是一次激动人心的智力上的探险之旅。无可置疑的是，我们的后辈，当他们解决了由于我们初创时的粗陋而造成的问题，会有更好的时代等待着他们。除了良好的祝愿和我们在场冒险中所表现出的高尚精神，我们没有什么更好的遗产能留给他们。”

P3 墓地里的不朽战斗 许知远 = 文)

P4 如何描述中国的世纪 黄一琨 = 文)

P5 了解与不了解 李翔 = 文)

P7 《经济学》的选择 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 = 文)

P8 转瞬即知 方军 = 文)

P9 四十个好年头 欧文·克里斯多夫 = 文)

P11 不确定感 本·雅各达 = 文 于威 = 译)

P12 1790 年妥协 连清川 = 文)

P13 黄集伟阅读笔记·七月 黄集伟 = 文)

P14 惟有祈祷 王康 = 文)

“与上帝摔跤”的人 傅显舟 = 文)

P15 舞动的历史 殷练 = 文)

P16 一生的文学珍藏 苏童 = 文)

P18 天瓢之雨 易晖 = 文)

P19 本期荐书 方军 = 文)

经济观察报
The Economic Observer's Review of Books
书评增刊

NO.21

(赠品)

执行主编：许知远

编辑：张帆 方军 殷练

设计总监：邹波

美编：肖利亚 姜坤瑛

制作：吴艳霞

编辑部电话：8610-64209024-121

书评增刊网站：www.mindmeters.com

思维的乐趣

mindmeters

社址：山东省济南市泺源大街 23 号中银大厦 22 层

北京记者站：北京市东城区兴化东里甲 7 号楼(100013)

招商热线：65525326、65525315、65525323

传 真：65525466

网上购书独家支持媒体：

joyo.com 卓越网
超越平凡生活

墓地里的不朽战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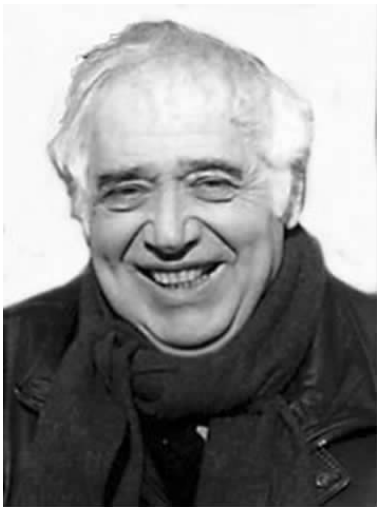
——布鲁姆和他的《西方正典》

许知远=文

马 尔罗似乎曾说过：“每一个年轻人的心都是一块墓地，上面铭刻着一千位已故艺术家的姓名。但其中有正式户口的仅仅是少数强有力的而且往往是水火不相容的鬼魂。”

游荡在我的那块墓地上无疑都是孤魂野鬼，他们大多是二流、三流乃至四流的角色，他们在我的身体里争吵、扭打，偶尔达成暂时的和平协议。很多时候，他们毫不理会我的存在，当我思考时，他们总是乐于提供自己的见解，当我想表达时，他们就不由分说地从喉咙里冲出来。

他们的存在，一直令我矛盾重重。一些时候，我被沮丧所包围，因为眼看着我的头脑变成别人的思想的跑马场（连这句话也是叔本华所说的）。爱默生的警告让我惴惴不安：这些在图书馆研究西塞罗的年轻人忘记了，西塞罗正是这个年纪写出了这些作品。另一些时候，我又被鼓舞，博尔赫斯说所



布鲁姆

短时间内吞咽下大量信息，记住了大量的名字，知道了无数可让平庸文章熠熠生辉的漂亮引语。但代价或许更为显著，知识是极度碎片化的，情感是不连续的，对事物的理解充满了过分粗暴的误读，我丧失了一种深入情境

26 位他心目中的经典作家被排列在这本超过 400 页的书里。不可避免地，他们之间充满了“影响的焦虑”的关系，晚出生的作家总是试图超越先辈，于是文学史变成了强者之间的战争，弗洛伊德与乔伊斯都对莎士比亚又爱又恨，托尔斯泰则觉得只有《战争与和平》方能和荷马史诗相比……

非常遗憾，我几乎没有稍微认真地阅读过这些经典作家中的任何一位，对他们的了解仅限于文学史上的人物传记。即使可以对布鲁姆对于文学细节的分析倍感迷惘，你仍可以从感受到其中一种卓越的乐趣——阅读是一场真正的内心的战斗，其中充满了英雄式的焦虑与自我发现过程。

所以，你必须真心诚意地投入其中。在阅读这本书时，两个图景时常浮现在我眼前。一幕是，在一个风雨交加的漆黑夜晚，已经超过 70 岁的、白发阴郁的布鲁姆坐在窗前重新阅读《失乐园》，令人惊异，这部他读了无数

生活与内心悲剧的勇气。

在这本书的结语里，布鲁姆认定他心目中的理想读者：他们“既不是为轻松愉快而读书，也不是为了消除社会罪孽而读书，而是为了扩展其孤独的生存而读书”。我不知道，在漫长的未来，它是否会有助于我重新理解阅读。我的症结正是，过分强调书籍的知识性，而忽略了它真正的宝贵因素：情感。在一个 Google 的时代，你早无须记忆任何东西，这也决定情感成为人们最渴望的东西。人们希望去体验爱、死亡，知道如何面对不可抗拒的力量，如何保持优雅与从容，不丧失尊严。而且几乎是在所有时刻，是情感、而非所谓的理性分析，左右了我们的生活，比起知识之树，生命之树更重要，所以在布鲁姆的谱系中，没有什么比力量更让人迷恋的东西。

我的墓地上所刻的名字都太浅，我没有和这些孤魂真正纠缠过，没能感受到他们的重量，我只是知道了他们，

阅读就像生活本身一样，只有经过庄严、疲惫的甚至不无悲惨的战斗，你才能断定你真正生活过。经典们能教给我们的正是这些

有的作家都在完成同一本书，本雅明愿意倾毕生之力写一本“完全用引语构成的伟大作品”。

人们总容易走向某个极端，一些人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沦为死去的灵魂的俘虏；而另一些人却可能惊人地无知，他们为自己所谓的创造性欢呼，却不知道歌德对艾克曼的抱怨：“人们总是在谈论独创性，但独创性到底是什么？从我们呱呱坠地时起，世界就开始对我们施加影响，这影响一直持续到我们生命的终结。”

大约 24 岁时，我致力于成为一名文学批评家，勃兰兑斯对 19 世纪文学流派的描述，本雅明的过分浓缩的文体，韦勒克的近代文学批评史都曾让我心醉神迷，进而误入歧途。比如当提起 T.S. 艾略特时，我首先想到的是他的散文，而不是诗歌；还培养出一个糟糕的能力，很少阅读原著，二手资料变成养分来源，依靠书评、前言、后记来撰写文章变成了我的习惯。

这种方法的后果显而易见，我在

之中的深刻的理解力。

如果按照哈罗德·布鲁姆的标准，其实我从来没有学会阅读。这位文学批评家或许是今天文学批评界最不可思议的人物，他因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创造了“影响的焦虑（influence of anxiety）”一词，而奠定声誉。他臃肿的、莎士比亚笔下福斯塔夫式的外表，与他脸上蕴藏的巨大愁容形成鲜明的对比；在一个大众文化席卷全球之时，他坚决地捍卫精英传统，几乎对于所有知识上的时髦嗤之以鼻，在每一个人人都谈论“download or die（下载或消亡）”、超文本链接取代印刷品的年代，他却告诉年轻人，你该去阅读荷马、莎士比亚与奥斯汀；他觉得作家电视上推销自己的书籍很可耻，很少签名售书或公开演讲，却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当他决定写作一本研究西方传统中最经典作家的严肃作品时，出版公司愿意预付 60 万美元的预付款，这就是《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可朽作品》……

遍的长诗，似乎一下子又变得全然陌生了，一行行诗句又变成一条条他从未踏足的小路，经典总是保持着某种陌生性，它让你的每一次探索都遭遇惊奇；而另一个场景则必须回到 60 年前，刚刚度过大萧条的 1939 年的美国，那个时候他才 7 岁，是个胖胖的小男孩，家里最小的、也最得宠爱的小家伙，他说服两个姐姐带他去公共图书馆，在一排排书架里，他发现了叶芝、雪莱、布莱克、斯蒂文斯，他总是焦虑地期盼着四周后还书与借书的日子，紧张地看着那些诗人们，生怕他们被别人借走。

从那么早就开始的阅读体验给予布鲁姆什么？他迷恋上书籍的纸张、外观、重量、手感，甚至书页空白，但更重要的是，这些经典使他知道如何面对自己的孤独，他相信“这一孤独的最终形式是一个人和自己的死亡相遇”。他内心天然的悲剧性，他对一个身体残疾的儿子的苦恼，都在那些人物的动荡命运中寻找找到解脱，和面对这种

却从来没有恋爱过，也没有仇恨过。如果将求知与愉快，视作阅读的目的，无疑它是懒惰的。阅读就像生活本身一样，只有经过庄严、疲惫的甚至不无悲惨的战斗，你才能断定你真正生活过。经典们能教给我们的正是这些。■



《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可朽作品》
哈罗德·布鲁姆/著
江宁康/译
译林出版社
2005 年 7 月

如何描述中国的世纪

为中国两千年历史的最后一卷写结束语是件冒险的工作,但我们的著述既已涉及现实状况,如果不提出一些当代的看法,似乎过于怯懦

黄一琨 = 文

1972 年到 1975 年，当申卡尔教授就读于希伯莱大学攻读中国历史的时候，这个系是以色列唯一一个与中国有关的科系。他说，当时几乎没有人做中国的研究，所以人们总是问他，为什么对此感兴趣，他们都以为他疯了。

20年后，已经加入美国国籍的申卡尔完成了《中国的世纪》一书，并迎来中文版的面世，关于中国的话题已经成为显学，而出版界则疯了。空中飞人式的访问方式，而且足迹只涉及上海陆家嘴，这样的操作方式造



奥戴德·申卡尔

就了一大批智识平庸，叙述道听途说，且观点陈旧不堪的书籍。

现代社会的特征之一是作秀，一切直接存在的事物都转换为一种表达，处于各种作秀逐渐汇集成“具体的生活倒影”的状态。所以，这些图书为了解中国砌上了一层厚障壁。如果据此而自说自话，以为习得了真理、规律、路径，那更会谬以千里。

公允地说，申卡尔教授的这本著作并不在此列。研究中国三十年，每年到中国两三次，以及研究中国历史的背景，足以保证《中国的世纪》超越一般品质。如果将本书局限在商务书籍的范畴，本书堪称优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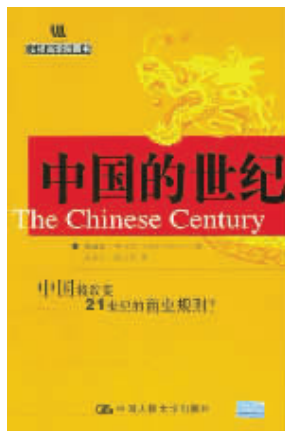
作为一名有着长期商务研究经验的学者，申卡尔认为，由中国的进步引起的震动并不是暂时的、周而复始的，相反，它代表的是对全球商业系统的根本性重建以及关键客户的重新配置。在制造业和资源行业中，这已是一种现实。19 世纪 40 年代，一位

英国作家满怀期望地说：“如果我们只劝说在中国的每个人把他的衬衫下摆加长一英尺，我们将会让兰开夏的纺织厂连续不断地工作。”而大约160年后，这个关于中国对纺织品和成衣业影响的设想即将变成现实，只不过加班加点的纺织厂不在兰开夏或北卡罗来纳，而在江苏和浙江，至于消费者则遍布全球。

据此，申卡尔给那些对这一系统重建半信半疑的人们提供了一幅比较完整的图景，关于外包，关于贸易保护主义，关于技术转移。对于跨国公司来说，中国是一个奇妙的市场，高露洁牙膏、雀巢咖啡、戴尔电脑、大众汽车……什么样的产品都能在这个市场上受到追捧。但同时，进入中国也意味着与本土企业相比，它们只有两种前途，获取成功或者难以立足。在这一问题上，作为一名合格的商学院教授，申卡尔教授给出了足够的信息。

但是，本书的最大卖点并非在于一本商务书籍，而是书名所提示的《中国的世纪》。申卡尔启发性地提问说，中国经济发展的特殊之处究竟在哪里？中国大陆是否只是发展中国家长长发展链中的一环，只是从“亚洲四小龙”手中接过接力棒并传递给下一位——越南或是印度？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是否会像亚洲金融危机后停滞的日本或者“亚洲四小龙”一样，在成为纸老虎后停滞失败？

这都是些难以有答案的好问题。申卡尔的办法是类比，然而他也承认，尽管类比是观察理解世界的有效办法，但很多事实证明，这种办法也有局限性。比如，我们也许会发现，美国的经济起飞阶段，在劳动力成本方面比英国具有绝对优势，因此美国纺织业对于英国有比较优势；同时，那时美国也是在侵犯知识产权方面记录最糟糕的国家。但这样的类比并不



《中国的世纪》

奥戴德·申卡尔/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年 5 月

能帮助我们预测未来。

在申卡尔教授那里，所谓“中国的世纪”指的是中国会在未来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海外评论者认为，申卡尔在本书中表现得过于乐观，并没有对“中国世纪”的弱点给予充分关注：正趋于老龄化的社会、脆弱的金融系统、资本市场的不完善、经济的低效、服务行业的薄弱、熟练技术工人的短缺。

但在我看来，关键在于，如果“中国的世纪”和“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只是两种说法的同义反复，这本书的价值将会大打折扣。可以看出，申卡尔教授在这本薄薄的书中努力试图弥补这一不足。他试图证明，中国的独特性在于“特殊的传奇，不同的制度，伟大的雄心和特殊的资源，能量与议价能力”，中国的独特性还在于面临的时机，它的发展处于

中国著名形象咨询机构——西蔓色彩

**为您打造
国际化商务形象**

西蔓形象工作室一对一咨询项目

①女士银卡会员服务
个人形象基本理论
仪态、发色、妆容、服饰
个人形象规划、设计
会员价：**2600**

②女士金卡会员服务
个人形象色彩理论、诊断
个人风格色彩规划、诊断
个人形象色彩、妆容、服饰、设计
综合形象指导
商务礼仪、沟通、谈判、技巧
仪态、妆容、服饰、设计
会员价：**5200**

③女士钻石卡会员服务
女士形象、妆容、服饰、设计、指导
商务礼仪、沟通、谈判、技巧
仪态、妆容、服饰、设计
个人形象、妆容、服饰、设计
会员价：**7600**

④男士银卡会员服务
个人形象基本理论
仪态、发色、妆容、服饰
个人形象规划、设计
会员价：**2600**

⑤男士金卡会员服务
男士个人形象、妆容、服饰、设计
个人形象色彩、妆容、服饰、设计
个人形象色彩、妆容、服饰、设计
会员价：**5200**

大众形象咨询书籍

包括：《女士形象》、《男士形象》、《商务礼仪》、《沟通、谈判、技巧》、《仪态、妆容、服饰、设计》、《个人形象规划、设计》、《综合形象指导》、《商务礼仪、沟通、谈判、技巧》、《仪态、妆容、服饰、设计》、《个人形象、妆容、服饰、设计》、《会员价：7600》

欢迎订购 西蔓全新教材

《女士形象》、《男士形象》、《商务礼仪》、《沟通、谈判、技巧》、《仪态、妆容、服饰、设计》、《个人形象规划、设计》、《综合形象指导》、《商务礼仪、沟通、谈判、技巧》、《仪态、妆容、服饰、设计》、《个人形象、妆容、服饰、设计》、《会员价：7600》

服务热线：010-85182738

于西蔓 女士
中国色彩咨询行业创始人

著名形象咨询专家
著名色彩专家
中国文化部一级艺术形象设计
日本文化厅认证色彩规划师
中国人民大学MBA特聘教授
2004中国地区十大杰出经理人
2004年度经济女性人物
北京西蔓色彩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北京西蔓色彩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中国首家专业色彩咨询公司
中国色彩咨询行业开创者
中国首家成功操作企业品牌识别系统
其内大型企业形象、培训和服务系统
综合中国人力资源管理中国人形象提升分析系统
国内第一例城市居民形象规划项目
商业色彩、陈列、装饰色彩设计成功典范
创业企业、品牌、中国MBA精英、
七年共1000多家企业的品牌规划
日本立邦公司指定中国合作伙伴

010-85182738 www.ximancolor.com
地址：北京市东长安街一号东方广场W3座504—506室（邮编：100738）

POLITICS



约翰·内森

了解与不了解

信服地说出它的特征。

才华不够或者是过于匆忙想表达自己的观点的观察家们不但受到攻击,而且也攻击别人。知识分子们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他们回避他们正在背叛的应尽的职能的存在——即辨别和智识的职能”,安·兰



《无约束的日本》
约翰·内森/著
周小进/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年4月

德的抱怨在 40 年后显得尤为明显,我们始终缺乏认真而明智的观察家去描述我们生存的时代具有何种特征,去履行知识分子天生应该具备的辨别和智识的职能。

与这种失职相对应的是,一种非理性的思维习惯在社会中蔓延,每个人被自己先入为主的偏见所支配。我们攻击假想中的敌人,故意被偏见夸大。民间培养起来的两个国家之间的相互仇视往往如此。对照到中日两国之间令人尴尬的关系,可以说,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日两国知识分子的失职。他们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让容易冲动的民众真正了解自己所仇视的那个国家究竟是何状态。首先是,他们没有耐心去了解一个国家,因此,即使当他们开始试图向公众阐释自己对那个充满争议的邻国的理解时,也会遭到“你根本不了解”的指责——必须说明的是,一部分原因是他们可能真的不了解。他们热衷于呈现的是能够支持自己先入为主的观念碎片,从没有足够敬业到能够系统地描述出邻国状态的程度。这种令人失望的作品已经出现太多,“根本不了解”的抨击让读者和作者都感到沮丧。(下转 P6页)

李翔 = 文

—

当一个外来者试图对他作客的国家发出议论时,在很多情况下,即使不夸口自己的洞察力,他也会认为自己所发出的言论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当然,不幸的是,有很多生活在这个国家的和自以为对这个国家很了解的人不这样认为。

我们已经听过了太多这样的指责,“你根本不了解某国”。做出这种指责太过容易,因此往往争论的双方都可以利用它来嘲笑对方的观点和无知,从而显示自己的睿智和正确。一个最近的例子是,一位资深教授指责麻省理工学院的黄亚生副教授,说他根本不了解中国。而黄亚生则在写给《金融时报》的专栏中,尖刻地说,这位指责他不了解中国的教授连汉语都不会说,只到过中国一次,而他,黄亚生,则是在中国土生土长的。

绝大多数中国近代历史学家在他们描述中国的书的前言,都不会忘了说,他们超越了费正清描述中国近代史时所持有的“(西方)刺激——(中国)反应”观点,以及另一位汉学家所持有的“传统——现代”观点,毕竟,这些汉学家还是不了解中国。傅高义在写出《日本第一》之后,人们嘲笑他说,他一定是戴上了“玫瑰色的眼镜”。戴着有色眼镜去观察的指责随后被加给了一位中国观察家马立诚,人们说,他在日本走马观花所得到的印象根本不足为凭,让中国人相信自己需要对日新思维;他根本不了解日本,那个东亚的恶棍,怎么可能变得爱好和平?

你懂什么,你能代表谁,你根本不了解……如此强势的不容商量的语句充斥大多数批评之中。如果你不是托克维尔或者本尼迪克特,最好不要作为一个外来的观察家发表对一个国家的见解;托克维尔被美国人认为比自己更理解美国,本尼迪克特被日本人认为更理解日本,但不是每个兴致盎然的观察家都能写出《论美国的民主》或者《菊与刀》的。我们时代的一个明显特征就是没有人能令人

一个不断加速的全球化过程中,面临复杂的因素:多边合作组织;自苏联解体后最重要的地缘政治力量;主要工业国家,特别是美国的经济重构的压力。当然这只是这一变化过程中的因变量,至于会得出什么样的结果,谁都知之甚少,而中国未来最大的确定性就是它的不确定性。

但申卡尔教授值得赞赏的地方在于,他拒绝套用既有模式——无论是东亚模式还是“美国例外论”来解释中国问题,并且采用一种阐述性而非综述性的方式进行论说。这样的方式,显然一时难以得出什么确定性和完全具有说服力的结论,但这个过程是严谨而富有建设意义的。

与之相比,我们曾经接受过某种生吞活剥的分析方式,比如在一个只是最近几十年才展开“高度的商品经济”的国家里,造出市场经济萌芽的阶段。又比如《资本论》中一共只提到十次中国,没有一次以之为主体讨论对象,并且七次是与印度并列,论述的是殖民地性格的市场,但我们却长期奉为主臬,将中国传统社会嵌入封建社会的分析框架中,收获不多。

具有深厚中国历史功底的申卡尔教授没有囿于这些桎梏,他提醒人们不要忘记历史遗产对于今天中国的影响。的确,每到一定历史阶段,某些议题又会再次成为社会生活的主题:比如一个有效力的中央政府和地方的创新系统,行政管理体的效率和机构规模的恰当比例,企业家精神与现有政治社会体系的共存等等。

麦克法夸尔在《剑桥中国史》的后记中说,只有在一个世纪以后,才有可能就中国的事业提出全面的看法。为中国两千年历史的最后一卷写结束语是件冒险的工作,但我们的著述既已涉及现实状况,如果不提出一些当代的看法(即使这种看法可能只会成为未来历史学家的笑料),似乎过于怯懦。

而申卡尔教授的这部书可以稍稍刺激你观察和发现的雄心。■

了解与不了解

(上接 P5 页)

加利福尼亚大学日本研究专业的教授约翰·内森出版的《无约束的日本》应该让中国知识分子中热衷于描述中日关系的人脸红。对于这个与自己关系重大的邻国,从来没有一位中国知识分子做出过如此出色的描述。内森教授不是单纯的访问者,用走马观花来指责他的人只能是嘲笑自己。在书的引言中,内森教授回忆留学时他如何让日本人相信他能够理解他们的语言:在酒吧里来场认字比赛,日本人对一个美国人能够认识如此生僻的日本单词瞠目结舌;或者违规时给警察朗诵一段《源氏物语》——我想这相当于日本的文言文。他几乎是通过同样的方式来让读者相信,他所描述的日本是真实的。他采访了漫画家小林善纪、政治家石原慎太郎和田中康夫、小说家大江健三郎、软银的创始人孙正义、日产的新总裁卡洛斯·戈恩、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创始人之一藤冈信胜等在日本具有很大影响力的人,而这仅仅是他访问名单的一部分。他采用了记者收集资料的手段,同时却具

有学者的洞察力。

他的叙述从日本传统家庭价值的崩溃、到日本商业模式的变化和公司家族体制的解体,以及与此同时日本新的企业家的崛起,作为中国读者,我们更关注的还是他叙述的日本新民族主义的兴起和表现形式。内森教授通过大量的采访试图揭示出民族主义兴起的背景和日本人的心理,他采访了对民族主义具有煽动性的漫画家小林善纪和民族主义的代表人物。《日本可以说》的作者石原慎太郎。他介绍了日本《新历史》教科书的编撰,原因很简单,日本人不能接受这样一个事实:我们的先辈一无是处,全是错误,我们的历史全无可取之处,这让所有人在心理上无法承受。

新民族主义的兴起在内森教授看来,是由于日本国内对自己尊严和确定身份的追求。日本人迫切地想要知道自己是谁,而且他希望,自己的民族是一个颇有尊严的民族。这个民族不是为了换取经济发展而在对外政策上屈从于美国的,也不是受了中国影响的,无论是传统还是以往的罪行。

在约翰·内森的叙述中,日本和中国的相似之处其实很容易被发现,不仅仅是在传统家庭价值的崩溃和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新的价值观上,即使是在民族主义的兴起之上,也有很多共同之处。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也在通过掩盖、曲解等方式塑造我们自己的历史,这样我们便能够接受一个单一的身份和单一的事实,而这有助于我们理解自己是谁:曾经的受他国侵略者和后来的社会主义英雄。当然事实或许有出入,我的一位在中国留学的韩国朋友,他的爱好之一就是向他碰到的中国人解释,历史上中国侵入韩国多少次。日本的新民族主义者希望通过向邻国表示傲慢和强硬的方式来确定民族的尊严和身份,寻求日本在国际上的地位,我们的民族主义者呢?

但是,从没有一位热衷于中日关系的中国知识分子告诉大众关于日本的这些。

三

内森教授的本意并不在于进行

这种比较,尽管我们可以从他的书和自己所作的这种比较中受益匪浅。作为一位日本专家,他的工作仅仅是试图去描述当代日本的变迁和日本的焦虑。日本作为一个重要的邻国,这部分工作本来早就应当由我们的知识分子来完成,可惜他们实在太过玩忽职守,仅仅停留在走马观花的旅游、理解不理解的争论上。对于印度,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宁肯选择坐而论道,热衷于争论,却不知道争论的不是同一个印度,只是彼此想象中的印度。

我们首先必须做到认知和理解,然后才能去辩论。知识分子的职责很大一部分就是帮助大众去理解和认知。可惜在大多数情况下,大多数人都停留在激烈的辩论上,而可笑和令人脸红的是,辩论的一个最大主题就是理解与不理解。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不愿花费时间和精力去理解而造成的偏见。而接下来,偏见遮蔽了理智,难以理解的,就仅仅是自己内心的偏见了。不过,值得庆幸的是,我们还能看到翻译过来的书。■

读者通过订报卡可获得



1年期报纸



同期电子版阅读权限



增刊



新闻邮件服务



现在购买订报卡还将赠送:

- 两周年合订本光盘 (价值76元)
- 3个月下载使用金融界“中国股市X档案”服务
- 3个月网易188财富邮服务 (www.188.com)

订报卡目前已开通 北京/上海/广州 等15个城市 其他地区正在开发中,敬请关注!

EEO.COM.CN 经济观察报

订报卡

经济观察报
The Economic Observer

EEO.COM.CN
新锐经济文化产品·全球华人同步阅读 100+50¥
卡号:
密码:

经济观察报
The Economic Observer

详情登陆 **www.eeo.com.cn**
咨询电话 **010-64297521**

EEO.COM.CN
新锐经济文化产品·全球华人同步阅读 100+50¥
卡号:
密码:
经济观察报 订报卡

《经济学》的选择

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 = 文

现代经济科学解释了为什么市场往往不能产生有效率的结果,以及为什么市场往往会导致很高的不平等——高于致力于社会公正和团结的社会可以接受的水平。如果没有好的规制和法律,例如,不能确保有比较完善的公司治理,中国将不能吸引到支撑其增长所需的投资。当然,过分简单化的自由市场意识形态会有利于某些利益集团。就对付特殊利益集团和意识形态而言,没有比了解经济学原理更为有效的工具。

《经济学》这本书的一个主要目标是帮助人们了解市场的优点和局限性,以及政府的适当作用,从而使对经济政策的讨论和决策都能够建立在现代经济科学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意识形态的基础上。

自从完成《经济学》第一版以来,我一直参与经济政策工作,试图将第一版中阐述的某些基本思想付诸实践,将这些思想解释给总统、首相和议员们。从1993年到1997年,我成为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一员,后来成为该委员会的主席和总统内阁成员。在这些职位上,我为国家经济委员会服务,而在出现了与经济有关的问题时,也为国家安全委员会服务。从1997年到2000年,我出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直接参与围绕全球经济危机的政策争论。

当这个十年行将结束时,我主持了对东欧和前苏联国家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进行批评性的评价。对大多数这些国家来说,这一转轨并不成功,所承诺的繁荣并未出现,相反,贫困在增加,收入在下降。这些国家的失败与中国的成功形成鲜明对比,并引申出了一些重要的问题:为什么结果会出现这样大的差别?在何种范围内,这种差别可归因于特殊的政策?对经济学和经济政策而言,从这些经验中可以得到什么教训?

这些讨论往往十分热烈。我曾指出,许多国家在经济危机期间推行的政策加剧了经济衰退,而一个国家的经济衰退会加深其他国家的衰退。在经济危机风暴过去之后,这种看法得到广泛的认同。出于同样原因,日渐统一的想法是,俄罗斯和其他转轨国家



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

推行的政策——休克疗法政策导致异常迅速的私有化和自由化——是导致这些国家转轨失败的主要原因。

诸如大萧条和1997-1998年的危机这样一些时期,虽然为置身其中的人们带来了很大痛苦,却为检验经济思想提供了良好机会。医生通常可以通过研究病理学,即当身体出毛病时发生了什么情况,而获得许多关于人体的认识。经济学家也是如此。《经济学》第一版所强调的一些主题已被证明对于理解1997-199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和转轨失败是十分关键的。例如,书中强调了金融市场的重要性和各国之间的联系。金融市场的脆弱是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的关键因素,而国家之间的联系则导致“传染”,像病毒一样,一个经济的疾病会迅速传播到其他国家。

一个国家在一个时期的经济问题与其他国家或其他时期的经济问题是不同的。一个时期的问题是失业,一个时期的问题可能是通货膨胀,而另一个时期的问题则可能是如何改善经济增长。同样,中国也经历了不同阶段:家庭联产责任制、乡镇企业、合资企业。每个阶段均建立在过去成功的基础上,每个阶段都有计划地处理前些阶段未能处理好的问题。

政治家和新闻记者都喜欢借助于简单的解决办法,使用流行的口号。然而,现实世界要复杂得多。不过,在所有这些复杂性的背后是一些相对简单的一般原理,尽管一个经济体面对的主要挑战可能会随着时间而发生变化,但背后的基本原理是相同的。

在我着手撰写《经济学》时,当时

的教科书中没有一本能够提供对现代经济学的充分理解。自从半个多世纪前保罗·萨缪尔森撰写的最后一部主要的、具有世界影响的教科书以来,经济学已取得巨大的进展。“信息经济学”(作者因此获得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编者注)对于理解个人和厂商的行为以及经济作为一个整体的运行,均具有革命性影响。考虑到不完全信息和对理性的系统偏离,经济学家对标准分析的局限性有了更好把握。与这些变化相平行的是经济结构的变化。在某些国家(比如美国),制造业迅速萎缩,就像一个世纪以前农业的萎缩一样。对与互联网相联系的“新经济”的许多讨论可能有些言过其实,但也确实出现许多实实在在的重要变化。

对中国而言,这些变化提供了新机会,也带来了新问题。互联网意味着世界上每个地方的人都可以接触到巨大的知识存量。将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分开的不仅是资源上的差距,而且是知识上的差距;而对那些掌握了互联网的人来说,这意味着知识的差距迅速缩小。

在发展中国家里,中国属于最善于利用新技术的国家之一。新技术也会产生新的问题——微软公司(Microsoft)这一新的全球性垄断厂商,突出表明了确保竞争政策的重要性,以及对于明显的全球性问题需要采取全球性的行动。为确保更多接触到这些重要技术,某些发展中国家(如巴西),采取了促进开发源代码技术(Linux系统)的措施。

在过去十年里有关经济政策的经历,使我深刻认识到一部反映这些思想变化和我们周围世界变化的教科书的重要性。

经济学是选择的科学,而写作一部教科书也涉及到许多选择。在写作经济学原理教科书时,做出选择尤其具有挑战性:有太多的东西需要讨论,但篇幅却有限!我深信,《经济学》的选择——既包括主题的选择,也包括每个主题中所强调的问题——涉及到了诸如技术进步和激励、私有财产与利润、竞争与贸易、通货膨胀与失业等十分广泛的问题,反映了在使学生了解经济学科丰富而广泛的内容与对当代关键性的经济问题的深入把握之间保持平衡的愿望。■

ECONOMICS



《经济学》第三版
约瑟夫·E. 斯蒂格利茨 卡尔·E. 沃尔什/著
黄险峰、张帆/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年6月



转瞬即知

方军 = 文

1983 年,一个艺术品商人向美国加州格蒂博物馆兜售一件号称是公元前六百年的希腊雕像。格蒂博物馆非常谨慎,它进行长达 14 个月详尽的调查,请加州大学的地质学者斯坦利·马格利斯对用精密显微镜和 X 光这个雕像的年代进行分析,法律部门在关于这个雕像的法律文件中找不出任何破绽,人们所相信的理性分析证据都

支持买这个雕像没有问题。

但是,从一开始就有很多人觉得这个雕像看起来有点不对头。意大利艺术史学家法德里克·泽瑞是格蒂博物馆的理事,他第一次看到这个雕像时就盯着它的指甲看,不知道为什么,他觉得很不对劲。当格蒂博物馆馆长揭掉覆盖在雕像上的布,很自豪地对意文尼·哈里森说,“这还不属于我们,但几周后就是了。”希腊雕像专家意文尼的直觉反射地说:“听到这个我感到很遗憾。”

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馆长托马斯·霍文喜欢用一个词记录他的第一反应,对于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雕像,涌现到他大脑的词却是“新鲜”(fresh)。在将这个雕像运到希腊,更多的古希腊艺术专家在看到它第一眼时感到“直觉上的排斥”,尽管无法说出为什么。最终的结果是,他们在看到这个雕像最初两秒钟得出的反应是正确的。

这两秒钟常常被人们所轻视,在当代社会,人们倾向于认为收集的信息越多、投入的时间越多,理性化、逻

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
(Malcolm Gladwell)

他最擅长发掘那些日常生活中的最细微现象。他的“引爆点”理论已经引发流行,现在他的关于我们遇到人、产品、地方的第一印象的分析可能再次流行,并再次改变商业世界

辑化的判断更为准确。但正如这个故事展示的,最初两秒钟的第一印象可能提供理解世界的更好工具。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是《引爆流行》(The tipping point)作者,在上一本书中,他精辟诠释各种思潮和趋势如何变成社会流行风潮,他因之被《快速公司》称为美国的“营销之神”。这一次他要告诉我们的,在现场即时做出的决策通常都具有惊人的洞察力。

最初几秒钟的反应常常是无意识的,但如果意识到它,一切将被改变。马尔科姆最擅长的就是提醒我们注意到类似问题的存在,无数商界人士说他的上一次提出“引爆点”改变了他们做生意的方式。在商业世界,马尔科姆是新的“先知”、“21 世纪的彼得·德鲁克”。

根据瞬间印象做出判断的准确性超乎想象。假设你在大学里,你需要多久来判断你的教授是好还是不好?心理学家纳里尼·阿巴蒂做了一个有趣的试验,学生在观看教师的两个 10 秒钟无声录像片断后,他们对教师的教学能力做出评分;然后她把每个时间缩短到 5 秒,学生们做出的评分完全一样;缩短到 2 秒,评分仍然没有变化。阿巴蒂拿上这位教授一学期课之后的学生对他教学能力的评分进行对比发现,和只是看几秒钟录像片断得出的评分一致。

我们倾向于不信任这种“快速认知”,实际上它是非常有效的。这人对外界变动的机制有关,我们先潜意识地感觉到,然后先意识到,最后才慢慢地知道为什么。

有一个简单的赌博游戏,你面前放着四叠卡片,两叠是红色,另两叠是蓝色,你每次任选四叠中一个翻开最上面一张,有的卡片你可以赢钱,有的你要输钱,你的目标就是尽可能多地赢钱。但在一开始你不知道的是,红色的两叠是雷区,它的卡片可以让你赢得很多的钱,但如果你输的话会输非常多的钱。实际上,真正赢钱的策略就是只翻蓝色的那两叠卡片,这样你可以很有规律地每次赢得 50 美元,而你输的时候金额也不多。这里问题是,参加这个赌博游戏的人要花多久才会发现这个规律?
(下转 P10 页)

四十个好年头

欧文·克里斯多夫 = 文
闫婷 = 译

1965 年的纽约，我的老朋友丹尼·贝尔是哥伦比亚大学的社会学教授，我是 Basic 出版社的副总裁，我们都深深陷入了麻烦之中。我们的痛苦来自一种思维方式开始支配学术界内外的政治和社会的论说，而这种思维方式对于美国人的生活却是没有什么现实意义的。

在社会学家们中广泛传播的一种意识形态谬论是：穷人要想摆脱贫困就得去“夺取政权”并“取得权力”。这种似是而非的观点在社会学家和准社会学家中还是很有影响力的，它促使人们相信消除贫困的灵丹妙药是政治激进主义（依赖于政府行为）而不是经济行动主义（奖励企业家精神）。

我和丹都来自贫困家庭，虽然我们年轻时都经历过那些激进的岁月，但是惊讶地发现过去我们认为并不可信的观念在生活中重新获得了生机，在那些日子里，丹总是把自己形容成一个民主社会主义者（顺便提及一下，他现在仍然是）；而我则是抱有怀疑论倾向的自由主义者。当然，保守派人士认为政府在帮助人们摆脱贫困的问题上应当处于适当的位置，而我们却都认为帮助人们摆脱贫困是政府的一大责任。但我们都不相信政治激进主义能够帮助人们摆脱贫困。

那时，一个得到福特基金会以及其他一些基金会认同的学术谬论是：“自动化生产”有破坏人们的工作能力的危险倾向。虽然他们同时也过上了拥有大量闲暇的生活，但对于这种生活方式人们无论从心理还是道德方面都没有做好准备。显然，这些基金会、大学以及媒体（那时的媒体大多由大学学历的人构成的），他们认为自己有责任把美国人民从这种可怖的命运中拯救出来。其结果就是：产生了过多的学术会议，除此之外，还有过多的书籍。

丹比我更懂经济学，这些连经济学基本常识都一无所知的人令他感到愤怒，认为他们对经济体系和改革之间的关系一无所知。那些偏左派的人将马克思所描述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们过着田园般安逸的生活”变成一种梦魇，这让我感到十分吃惊。约翰逊总统针对“自动化会伤害到人们的工作能力”这个问题组织了

一个调查团，调查这个问题的可信度。委员会包括丹和一个麻省理工学院非常有才华的年轻经济学家罗伯特·斯劳（Robert Solow）。他们联合提交了一个非常审慎的报告，成功驳倒了“自动化会伤害到人们的工作能力”这种观点。

这一系列的问题促使了《公共利益》杂志的创刊。在财务上，一个朋友沃伦·曼歇尔（Warren Manshel）投入了一万美金，使这份杂志有了创办的可能。他很快就指派了出版商，他、丹和我一起做编辑。而且我们得到了我们另一个朋友 Basic 出版社老板的帮助，因此最初杂志社的办公地点就设立在 Basic 出版社，我那间不大的办公室里。杂志社只有一个职员，就是我的助理秘书薇薇安·高尼克，她是一个非常有才干的年轻女人，不久她便作为一个女权主义者和作家，开始了自己在《乡村之音》的事业。我和丹设计命名杂志，我记得我们第一期杂志印刷了大概 1200 本。第一期的文章，我们只能是向我们认识的朋友、熟人约稿，第一期的专栏文章是由帕特·莫尼汉（Pat Moynihan）、罗伯特·斯劳（Robert Solow）、罗伯特·尼斯拜特（Robert Nisbet）、雅克·巴松（Jacques Barzun）、内森·格拉茨（Nathan Glazer）、马丁·戴蒙德（Martin Diamond）和丹尼·贝尔（Daniel Bell）所撰写的。第二、第三期的时候，选用了其他一些非常有名的作者的文章，包括詹姆斯·沃尔·森（James Q. Wilson）、埃尔·拉伯（Earl Raab）、密尔顿·弗里德（Milton Friedman）和皮特·庄克尔（Peter Drucker）——当然那时他们也不是个个都声名斐然。

开始的时候，我们的确定了一个简单的编辑方针：不讨论对外政策和事务。当时，越南战争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我们知道我们的团队在这个问题上有着非常深刻的见解，但是，我们不想将非常有限的版面浪费在越战问题上，因此我们采取了最简单而有效的解决办法，就是在我们的刊物上禁止所有关于对外政策和事务的文章。

同时，我们在财务方面也做了一个决定：所有的合作编辑都不开工资，原因也很简单，因为杂志的经费（随着发行量的提高，每年需要投入大量的钱）都是来自一个朋友的赞助，我们不想拿他的钱为自己谋利，这个原则一直坚持到现在，尽管现在杂志社的状况有了本质的改变。这种变化包括：我

MEDIA



欧文·克里斯多夫，《公共利益》、《国家利益》的创办人。自《公共利益》于 1965 年创立，他先后与丹尼·贝尔、内森·格雷茨合作编辑这本杂志。1972 年，他加入《华尔街日报》。他也是《美国民主主义思潮》（On the Democratic Idea in America）、《资本主义的两个胜利》（Two Cheers for Capitalism）、《新保守主义：观念的自画像》（Neo-Conservatism: The Autobiography of an Idea）的作者。

《公共利益》在出版 40 年后停刊。

们在办公室旁边又租了一个比较宽敞的办公室。在 1987 年，我们有一个最重要的改变：迁往华盛顿。

在随后的几年，我们不断得到认可，（唉，可惜在发行量上没有什么反映），也受到一些保守派人士的基金会的青睐。我在《华尔街日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劝告这些基金会不要再抱怨国家的福利状况，“通往奴役之路”、“中央集权下的经济统制”下的自由企业的消亡、个人所得税的不公，在文章中描绘了保守派的真实状况。我写这些并非因为我是“亲保守派”，而是认为如果保守派人士能够对世界上的重大事件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将对美国的民主制度的

完善非常有益。

我的文章引起了一些反响，至少一些保守派的基金会愿意从自我束缚的圈子里摆脱出来。第一个支持我们的是史密斯·里查德基金会（Smith Richardson Foundation），该基金会的经费都是由兰迪·史密斯（Randall Richardson）家族财团提供的。奥林基金会也紧随其后，我们的朋友也是支持者詹姆斯·帕尔森是该基金会最后的 20 年里的领导者。后来，原奥林基金会的执行官米歇尔·乔依斯建立了一个布莱德雷基金会，一如既往地支持我们。

在杂志创建的前七个年头里，大家普遍认为《公共利益》只是一个中庸的自由主义杂志（我们自己也这么认为）。毕竟，编辑们还有大部分的作者都是民主党人。帕特·莫尼汉（Pat Moynihan）曾在肯尼迪和约翰逊时期的政府任职；1968 年，我是休伯特·汉佛莱（Hubert Humphrey）运动的主要策划者。在 1972 年的大选中，我们这个圈子里的人第一次发生政治上的分歧。丹不愿意投共和党一票，对民主党代表乔治·麦戈文（McGovern）也提不起兴趣来。在这个时候，他辞去了合作编辑的工作，由另外一个老朋友迈克尔·哈林顿（Michael Harrington）开始代替他。我呢，一方面烦透了麦戈文的外交政策，一方面对尼克松的再度竞选也不感冒。我投票给共和党的举动在纽约知识分子的圈子里带来了一些冲击。在不到一两年的时间里，社会学家迈克尔·哈林顿（Michael Harrington）提出了“新保守主义”这个词语把我形容成一个自由主义的叛徒。面对那些感到懊恼的朋友，我决定接受这一称谓——“新保守主义”，也没有人抨击我是“自由主义者”了。同时我也不得不面对一个事实——我投了尼克松一票，对于学生和知识分子来说，这种做法就如同犹太人在赎罪日中无所顾忌地大嚼猪肉一般，这种行为简直就是一个自己把自己驱逐出教的做法，事实上，一些批评我的人认为我就像一个放弃自由主义信念的犹太人一样可恶。对于这些批评者来说，“新保守主义”被视为宗教上和政治上的异端邪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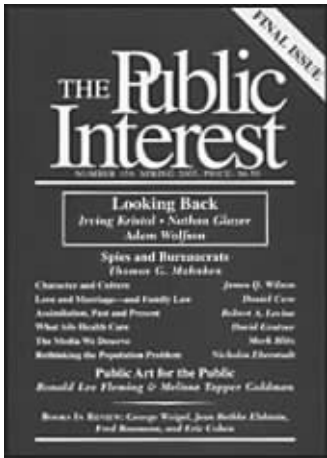
（下转 P10 页）

(上接 P9 页)

我们一些要好的朋友以及与《公共利益》杂志密切相关的合伙人都没有参与提出这个被认为是“异端邪说”的理论。我们的杂志仍旧会避免谈论任何有关党派政策性的东西,并把精力集中在社会改良上,这是我们创刊时最初的动力,我们也会一如既往——尽管我们的社论一直都是焦点。可以这样说,我们提供的是“面包”和“黄油”,激发读者从新的角度去审视各种问题,这些问题包括:贫困、贫富差距、教育平等、性教育、枪械管制,诸如此类。我们刊登了许多社会调查方面的文章,即使有些文章被认为是异端邪说。为了扩大我们的视野,我们也使用了很多比较新的经济分析方法,也顺便能够表明我们的客观性和独立性。

但是,我们决不仅仅单从经济学家或者社会学家的角度去思考分析问题。相反,我们很快就发现就像很难真正认清经济和社会问题背后的实质一样,同样也很难认清道德、家庭、文化以及宗教问题的本质。——就如同托克维尔(Tocqueville)所言,“思维方式”和“性格结构”决定了一个人的品质和性格。同样,社会学研究和深刻的社会分析使得我们的文章有着与众不同的特色。最近十年里,我们杂志的运气很好,先做执行编辑后来做编辑的亚当·沃尔夫森(Adam Wolfson)对这些方面的问题都非常感兴趣,给我们带来了活力。

在我看来,这种思维方式就是取自“新保守主义”的思维方式,我之后



在《华尔街日报》的社论版上每月发表一期评论,“新保守主义”就是在那里被滋生培养出来的。我对旧保守主义没有什么耐心,因为旧保守主义总是对历史的潮流和发展大声地喊“停”。我一点儿也不钦佩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或者阿尔夫·兰德(Alf Landon),我也不认为民主党的富兰克林·罗斯福就是魔鬼的化身。我的政治本能让我倾向于合理预期而不是应激反应,是抱着与现实合作的态度,而不是逆现实而行动。

为了给我在公共政策方面的思考提供更多的理论性的依据,我在纽约大学请了 1976 年到 1977 年一年的假(1969-1988 年,欧文·克里斯多夫是纽约大学商业研究所的教授,译者注),在华盛顿的美国企业协会研习经济学。在那里,我从传统的宏观经济学的幻想中醒悟,并且开始赞同“供应经济学”(通过减税来刺激生产和投资),虽然“供应经济学”这个词并不那么好听,我更

喜欢将它命名为“增长经济学”。这个发现让我在《公共利益》上刊登了朱迪·沃尼斯基(Jude Wanniski)的一篇支持供应经济学的文章,而且还第一次在文章旁边配上了图片——“拉弗曲线”。尽管没有引起广泛的注意,但是《华尔街日报》注意到了这篇文章。他们社论版的编辑、年轻的罗伯特·巴特利(Robert Bartley)在他们的日报上写了一篇关于我们杂志的文章,文章的题目是“欧文·克里斯多夫和他的朋友们”,华尔街日报开始继续宣扬“供应经济学”,将它应用于分析每天的问题,并且登载一些类似于“新保守主义经济”的内容。欧洲的经济增长仍然受到财政赤字的制约,而造成这种压力的是传统的“银行家经济学”,与欧洲的经验相比,《华尔街日报》所提出的这种新的经济学理论显得更为有效。

在对外政策方面,《公共利益》杂志仍旧是缄默不语。但我和其他许多作者还是在《评论》上表达了我们自己的观点(也由此产生了名为“自由世界”的委员会,由当时已经退休的政治家唐纳德·洛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领导)。《华尔街日报》、《公共利益》和《评论》,组成了被称作是“三驾马车”一样的阵容,人们非常惊讶地发现,这三个出版物(其中两份的发行量微乎其微)的共同努力竟然会产生如此大的影响,以至于现在人们如此关注“新保守主义”。

新保守主义中,文化之间的争论仍然是个问题。在《公共利益》中,这些争论主要集中在书评的版面。《华尔街日报》在自由主义者之间建立了联盟,

特别是在被反文化左派的过激行为所激怒的学术界当中。反文化左派坚持教育与宗教分离的理论,而且恶意攻击宗教,这可能会引发美国政治中教育与宗教的关系紧张。《公共利益》在这个问题上也有自己坚定的立场,它一直对宗教抱有好感,对于传统的政治和道德而言,宗教不仅仅是一种精神力量,还是一种社会力量。

或许可以这样说,《公共利益》被认为是超越了任何政治意识形态或是任何政治“立场”的杂志,当然,不可避免,我自己的政治立场会从这个杂志中流露,被公众所了解。但是因为杂志的第一位合作编辑丹·贝尔(Dan Bell)以及后来的帕特·格雷茨(Pat Glazer)的存在——使得《公共利益》一直能够保持观点中立的特点,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公共利益》关注的主要是社会调查和社会问题,另外就是我们一直保持学院派的严谨作风,我相信由于这些原因,以及它所体现出的知识分子的特点,它被媒体和政府圈子所接受,也被主流的学术界知识分子所接受,我冒昧地断言,它甚至在塑造与重塑社会科学的论述方式上也产生了很大影响。

在过去的 40 年,我希望对于杂志的读者们,还有杂志的编辑和作者们,都是一次激动人心的智力上的探险之旅。无可置疑的是,我们的后辈,当他们解决了由于我们初创时的粗陋而造成的问题,会有更好的时代等待着他们。除了良好的祝愿和我们在场冒险中所表现出的高尚精神,——我们没有什么更好的遗产能留给他们。■

(本文编译自《公共利益》第 159 期)

(上接 P8 页)

科学家对这个赌博游戏进行研究发现,大部分人在翻到大约 50 张卡片时会直觉意识到发生了什么,尽管他们说不上为什么选择蓝色的卡片。到了 80 张的时候,人们能够解释为什么红色卡片是不好的选择。这一切符合常识,这正是我们认识世界的方式、我们学习的方式:有了一些体验,仔细思考,然后总结一些规律。

但科学家们发现了更有趣的东西,在游戏过程中他们用机器持续测量游戏者手掌的汗腺,从而检测他们的压力反应,我们都知道有压力时手掌心会出汗。

通过这个测量,科学家发现,到第十次翻卡片时,游戏者就对红色的卡片感觉到压力,而还要再有 40 次他们才直觉上感到红色卡片有问题。在他们感觉到压力后,他们的行为也发生改变,翻红色卡片的时候越来越少。在游戏者知道自己知道游戏的规

律之前,他们已经“知道”了。

马尔科姆总结说我们感知世界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方式,我们对我们所学的东西进行思考,然后得出答案;另一种则是那些艺术品鉴定专家们对可疑的希腊雕像的方式,他们简单地看一眼,然后就感觉到答案。在后一种情况,他们知道答案是什么,但他们不知道为什么是这样。

最初几秒钟提供的信息非常丰富,我们的大脑天然地有着快速地从中得出自己判断的能力,但我们要理解这个机制,我们需要一些其他的辅助手段。虽然我们对这种判断的运作机理依然知之甚少,按马尔科姆的说法那是“锁着的门”。不过,他描绘了一种他命名为“把事件削成薄片”(thin slice)的方法,就是将目标锁定在几个显著的细节上。

我们都认为,要真正了解一个人,与他长期的交往是最好的方式,那样我们可以从各个方面了解情况。要严

肃地预测一桩婚姻的未来,似乎需要收集大量的信息、了解大量的背景才行,而华盛顿大学的约翰·戈德曼教授能够通过很短的夫妇俩交谈的录像准确地推断他们可能会离婚。

根据一个小时的录像判断 15 年后一对夫妇是否还在一起时,他的准确率是 95%;根据 15 分钟的录像判断,准确率约 90%。戈德曼教授从 1980 年代就设立“爱的实验室”对超过 3000 对夫妇进行研究。现在,他的同事发现,只要 3 分钟的夫妇俩交谈的录像,就可以非常准确地预测夫妇是否会离婚。能够根据这么短的时间预测婚姻超出所有人的想象。

戈德曼设计了一种他称为 SPAFF 的编码方法,20 种情感表现分别对应一个数字,譬如厌恶为 1,轻蔑为 2,沮丧为 12,中性为 14 等等。这样,他就可以将夫妇谈话录像转换为一串数字,每秒一个数字,15 分钟的录像为 1800 个数字,男方 900 个,女方 900 个。他

然后用计算机对之进行分析,可以得出对这桩婚姻的准确判断。

他是怎么分析的呢?简单地说他寻找的是积极或消极的情绪,因为他的研究发现,只有积极情绪与消极情绪的比率在 5:1 之上时,一个婚姻才可能延续下去。当然,戈德曼已经建立起一种直觉,把事物分解成薄片已经成为他思考方式的一部分,而不需要显式地进行这种分析,他甚至在餐厅里面听到邻桌夫妇的谈话就可以知道他们是不是需要雇佣律师处理离婚事宜。他是怎么做到的?他说没必要了解发生的所有事情,而只是关心四个关键情感表现:防卫、阻碍、批评与轻蔑。其中最糟糕的是轻蔑,如果发现婚姻中一方对另一方表现出轻蔑,那是婚姻陷入危机的最重要信号。

正如戈德曼的故事展示的,直觉判断的运作机制就是过滤所有不相关的东西,只留下真正重要的细节。我们在潜意识这一点上做得非常好,经常做出比深思熟虑更好的判断。■

不确定感

本·雅各达 = 文
于威 = 译

吉布斯是《纽约客》的万金油,因此回答《读者文摘》来信的责任就落到他身上,但这是他力所不能及的任务。在几番装模作样的清嗓之后,他承认:“对你们的订阅者,我的答案可能多多少少是否定的。我本人对《纽约客》的读者想看到什么样的稿子几乎一无所知。但是,我清楚地知道,他们不想看什么,因此我乐于传达这个信息。”这个名单包括“谜语、笑话、直截了当的新闻、不够委婉的俏皮话等。”

《纽约客》不想要的是出现在《生活》、《判断》和《星期六晚邮报》上面的东西。但是,谁也说不清到底什么样的东西他们想要。最难的,也是至今没有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处理严肃与幽默的关系。在第二期上发表的对第一期杂志的批评中,有人(可能是罗斯)写道:“我们和其他人一样,对似乎要渗透进来的轻浮与胡闹的风气大为震惊、恐慌,我们不想让它看上去与《判断》和《生活》没什么两样……毕竟,我们不想让人们把它当作一本幽默杂志。”但是,在这本杂志诞生后的头6年里,它恰恰被普遍地视作一本幽默杂志——而且,对很多人而言,这种看法一直保持到二战之时。几乎从一开始,感觉与现实就发生了碰撞,这本杂志的一些要素,如怀特的“笔记和评论”,还有前新闻记者莫里斯·马基的“自由记者”快讯,都在本质上传递出了清晰的严肃感。编辑和作者们卓越的才能和野心、日渐增强的1920年代经济好时光即将结束的预感(始于1929年的股市危机)、时间的流逝——所有这些因素都迫使人们转向不断涌现出来的严肃、艺术和意义。

这本杂志第一次有意识地运作是在1928年。当时的凯瑟琳·安吉尔给短篇小说作者们写了一封信,向他们征求严肃的小说,而莫利·卡拉汉、路易斯·伯根、萨利·本森和凯·伯伊勒用一批完全摒除了轻浮之气的作品对此作出了回应。第二年,安吉尔开始寻找“严肃的”诗人,他们中有些人在听到她的召唤时甚为惊诧。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回信说:“我真

的不知道《纽约客》对叫作诗歌的诗歌感兴趣。”更符合《纽约客》传统的诗人是格雷斯·哈扎德·康克林。史密斯大学的一位教授曾把她描述为“以写作温婉的诗歌著称。”但是这本杂志的转向让她摸不到头脑。在解释自己最近为什么没有投稿时,康克林在给安吉尔的信中说:“无论是《纽约客》的散文还是诗歌,人们都感受到某种特质:我觉得有点迷惑,不能说清楚它是什么,因此很难为这本想象



中的杂志写作。”

编辑们有时同样感到迷惑。怀特夫人在1929年探索性地拒绝卡拉汉的小说《在迷人的城市里》,正显示了这种整体上的不确定性:

写这封关于你最近那篇小说的信实在难以启齿……它是一个非常引人注目而且有趣的故事,在我们编辑部里引起了很大的争议。我们需要小说,我们需要短篇小说,但是,说到这一篇,罗斯先生认为我们要用的短篇小说必须要符合一个特殊的类型——《纽约客》式的——如果你还把这个词当回事,而他担心这不是我们能发表的短篇小说,可能因为它没有采用这种方式。

即使是伍尔科特在谈到严肃的小说时,也只能说明一点,正是这一点决定了这本杂志不会发表欧·亨利后期



的作品:“《纽约客》不喜欢那种被称作‘出人意料’的结尾。在最后一格里,一个以前身份不明的人,突然变成了一条水狗,或者一个小孩,或者胡佛总统,并不能让编辑们感到意外。”

他总结说:“虽然不能假托上面的概括穷尽所有,我觉得至少可以让你们的读者了解到什么样的东西不适合《纽约客》。什么样的东西适合,正如我前面所说的,是另一个而且更复杂的问题。我自己的感觉是,即使我知道,说出来也会让你们的读者失望。没有斗争的生活一定是非常乏味的,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

但是这本杂志的不确定感马上就会得到解决。到了1934年,《纽约客》创刊第十个年头,它已经成为美国文化和文化景观中的一处固定资产,一本其幽默的插图和语言、小说和新闻不仅受到普遍的尊敬,而且篇篇作品都具有不可否认的独特性的杂志。那一年,前任编辑拉夫·英格尔索为自己现在的东家《财富》写了一篇长文,第一次让《纽约客》受到全国性的关注。他在文章中写道,罗斯和其他的编辑们完成了“一件伟大的工作。《纽约客》改变了一代人的智慧……凭借精致带刺的双关语,它与一个还远不完美的世界进行了一场高贵的,虽然也是无用的战斗”。事实上,如果《纽约客》确曾有过一个黄金时代,那就是在“珍珠港事件”之前的那十年。这本杂志在1930年代初得以成形,不只是意外或者运气,而且是一个有机的过程。回想起来,它的成功似乎是必然的。其实不是。■

(本文为《About Town》一书节选)

1790 年妥协

——2001 年普利策获奖图书《建国兄弟》评述(三)

连清川=文

詹姆士·麦迪逊的名字虽然在立国祖先也是很响亮的。不过,在历史上,他更多地和汉密尔顿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因为他们一起共同以“帕布里乌斯”(Publius)的名字创作了不朽的《联邦党人文集》。

但这种兄弟情谊却同样地又是一种假象。事实上,麦迪逊和汉密尔顿在他们的人生中大多数的时间是处在对立的状态之中,尤其是后期,汉密尔顿是“联邦党人”的领袖,而麦迪逊却和杰佛逊共同构筑了“共和党人”的堡垒,处处狙击汉密尔顿试图巩固联邦权力的努力。1790 年,他们的冲突到了高峰。

晚餐

1790 年 6 月 20 日的晚上,刚刚从法国担任大使回国不久的杰佛逊,在自己的家里准备了一顿晚餐,参加的人除了他以外,只有麦迪逊和汉密尔顿。这顿晚餐的结果是美国历史上著名的“1790 年妥协”,简单地说,麦迪逊同意运用自己在国会里的影响力,帮助汉密尔顿的财政计划得以通过;而汉密尔顿也同意运用自己的政治影响力,帮助麦迪逊敲定未来首都的选址——波多马克(Potomac)河附近,也就是今天首都华盛顿的确切所在。

艾里斯认为,杰佛逊在关于迄今惟一流传的关于这顿饭的记载中夸大了自己的作用;因为虽然这顿晚餐是整个 1790 年妥协的一个节点,但是在晚餐之前和之后的斗争,才是真正决定这次妥协的关键。

但无论怎么说,麦迪逊和汉密尔顿的妥协是美国立国之后所取得的一个重要成果。通过他们的妥协,美国确立了商业社会的原则,也同样确立和联邦和地方分权的一些原则,又通过首都的设立,确定了美国西扩的原则。

但是这样几个令美国的未来受惠无穷的决策,在当时妥协的双方来看,却是充满了痛楚和愤怒的。

先从汉密尔顿这边说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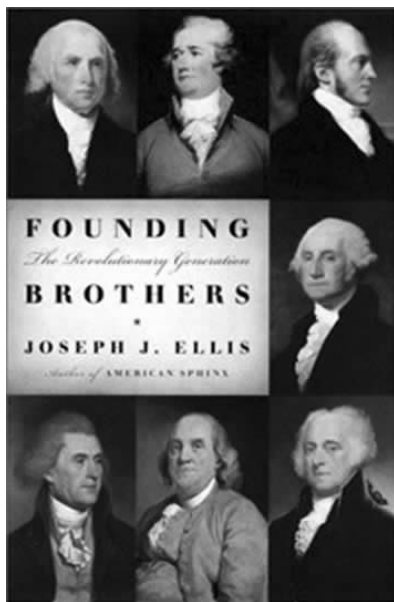
汉密尔顿的财政计划源于 1780 年代末。当时的华盛顿把在联邦政府成立之前的“北美邦联”的财政记录通

览了一遍之后大吃一惊:事实上,美国政府已经处于破产的边缘了,包括内债、外债和各州的州债,是美国政府当时的财政收入所无法支付的。因此,他让汉密尔顿拟订出一个财政计划来。

汉密尔顿在几个月不眠不休的工作之后,提出了一套联邦财政计划,总括地说,一,扩大联邦的税权;二,内债偿还的原则是战争期间所核发的“大陆券”政府债券,无论在谁的手里,都按照票面价值购回;三,成立一个联邦银行。

对于汉密尔顿所提出的计划的目的,修补联邦政府的信用,麦迪逊自然并不反对,但关键的问题是方法。其中的第二点,在麦迪逊-杰佛逊看来,简直就是对独立战争精神的背叛。

在战争期间,有许多人由于战争时大陆券贬值或经济困难,转让了自己手中所拥有的债券。毫无疑问地,政府债券的收购者,按照现在的说法是“机构投资者”,也就是富有的商人,他们的目的当然是一种投机:只要独立



战争胜利,他们就不但可以收回本金,而且可以获得利润。

在今天看来毫不出奇的“商业观念”在当时便是一种惊天动地的事情。在麦迪逊-杰佛逊看来,那些在战争期间购买大陆券的人,才是真正地支持独立战争和革命精神的人;而那些投机商人的目的无非是牟利,如果不分来源地购回债券,并且支付利息,岂不是支持投机,毁坏革命?

并且,汉密尔顿的这个计划,显然是建立在以商业为基础的社会设想之

上,尤其是当时的北部商业区将在这个计划中受益甚广;但是,麦迪逊认为,美国的社会基础是种植业,而美国未来发展的希望,也更是在农业。

汉密尔顿认为,只有不分身份地回购债券,才能建立国家信用,联邦政府也才能继续发行新的债券以筹集资金,进行经济恢复。于是,他们的冲突就变成了现实与精神之间的矛盾。麦迪逊发誓要用自己所有的力量来狙击汉密尔顿的这个出卖革命的计划。

妥协

他们之间的矛盾在其他的问题的堆积中更加尖锐起来。

虽然麦迪逊参与了《联邦党人文集》的撰写,鼓吹只有赋予联邦足够的权柄,整个原来的北美殖民地才能获得新生。但是这并不自动意味着放弃地方自治,更并不意味着对联邦权力的放任。在麦迪逊更加深层的思考中,州权的重要性,甚或高于联邦权。而联邦税权和国家银行,在他看起来,整个就是对地方权力的剥夺,而一个代替大不列颠的王国正在形成雏形。

他和杰佛逊一起提出了关于把新首都设立在波多马克河畔的提议(虽然一共有 16 个地方被提出来作为首都选址的考虑)。他们认为,这是对弗吉尼亚对于革命贡献的一种补偿,同时也是对于联邦权力的一种提醒。

但是汉密尔顿和华盛顿却对首都的选址有着另外的思考。在他们看来,显然是这两位来自弗吉尼亚的贵胄私心作祟。事实上从独立战争期间一直到 1790 年,弗吉尼亚在整个联邦中的地位十分显著,连华盛顿自己也是来自弗吉尼亚。但是,美国的发展应当是“西望”,也就是广袤的西部;在脆弱的西班牙殖民者和落后的印第安人手里的大片土地。如果美国要向更加广阔的内陆发展,就应当把首都设立在更加西部的地方,彰显这样的意图,为未来未雨绸缪。麦迪逊和杰佛逊的行为用两个单词就可以概括:弗吉尼亚王朝(Virginia Dynasty)。

当然,这些冲突说到底归结为他们对于一种理念的根本冲突:独立战争为了什么,或者是艾里斯所说的“76 精神”(Spirit of '76。1776 年独立战争正式开始)是什么?

麦迪逊-杰佛逊的答案是为了“殖民地人民的自由”,她的含义就是

个人自由、地方自治、联邦限权;而华盛顿-汉密尔顿的回答是“国家和法律”,摆脱英国殖民者的统治,建立独立然而统一的国家,以法律来指导生活。

在这样的冲突下,汉密尔顿的计划简直就是侵吞地方、新版殖民;而麦迪逊的计划就是诸侯分立、国家分裂。然而摆在面前的现实却是非常残酷的:没有对方的支持,谁的提议都无法通过。于是,他们必须痛苦地、诅咒地接受对方,形成妥协;每个人都是对自己的背叛,每个人都被对方挫败。

他们所想不到的是,这样痛苦的妥协,却为美国迎来了最好的前景。因为汉密尔顿的计划,国家的信用得以建立,一个建立在商业之上的经济逐渐成型;因为麦迪逊的坚持,地方的权力并没有被联邦所全面侵夺,自治得以在宪法的基础上保证;而虽然首都并没有站立在美国的最西方,但西进却成为未来美国不可阻挡的风潮。

当然,历史不是永远地如此给予丰厚的报酬。妥协的结果每一个人看起来都不是“次优”,而是“次恶”。它的效用就在于防止“至恶”的出现,因为既然分化的双边都看不到“至优”的可能性。

如果没有这一次妥协,汉密尔顿就永远像杰佛逊刚从欧洲回来时看到的那样“完全被击垮”了;而麦迪逊当然也无从得到他所要的“弗吉尼亚光荣”,那么在历史上,他们都是失败者。

在立国祖先那一代里,政治派别(或者政党)被看成是一种邪恶,而不是一种必须。华盛顿刻意地远离任何一种政治势力,无论是他所钟爱的汉密尔顿,还是激情澎湃的杰佛逊。而创造了共和党的杰佛逊,充满讽刺意味的是,曾经说道:“如果我必得和一个政党才能得以进入天堂的话,那我干脆还是不去”。

但是,恰恰是这样的一种结构,给任何一方的乌托邦梦想的设置重重障碍。任何一个政党或者派别的计划都必须对尘世研究透彻,对对方的狙击了解清晰,而且还必须对计划的完全实现有所保守,甚或向对方做妥协,才能得以进行。

1790 年妥协,在双方看来,都是一种建立在至善理想之上的次恶妥协,而历史却偏偏证明,它是建立在一种次恶理解之上的至善妥协。■

《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

[英]雷蒙·威廉斯/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新新闻》周刊第 828 期发表学者南方朔文章，标题是：《抬杠——毫无建设的口水浪费》。该文关键词即“抬杠”，作者一边梳理“抬杠”一词的词义变迁，一边揶揄台湾的政治文化。常识告诉我们，“词义”当然由人赋予，可它却并非自此属于人。其实，它更像一株可以自由生长繁殖、再生衍变的植物，而且，其祖先常常不留任何变异、成长的记录。所以，关于语词、词义，我们常辨认不清，漫漶含混，大惊小怪，以至于“笑问客从何处来？”

Genius(天才)一词在十四世纪开始成为英文中的一个词汇，其意涵主要源自拉丁文，而与其最接近的词源为拉丁文“genius”，意为“守护精灵”。而直到十七世纪末，“天才”一词才具有比较接近今人理解的含义：非凡的能力。在那场持续至今、波及全球、被文化人类学者称之为“新神话书写”运动中，在以哈里·波特为代表的一波又一波魔幻小说狂飙中，“精灵”的非凡与万能一直是其大同小异的母题，而以我等凡俗的理解看，那也就是本义中的“天才”吧？

而关于天才，其实向来人云亦云，意味繁复。在“the English genius compromise”这个句子中，因为有“compromise”，“genius”究竟是“特质”还是“天分”便难于甄别。左思右想现在最迷恋的正是“守护精灵”之类的动漫。对他们而言，“genius”应该就是“天分”，而所谓社会化或成长，则无非一点一滴将“天分”变成柔弱、妥协、骄矜之类的“特质”。童年消失的那一天，天才也便绝迹。

整本书最具体地展现着作者的博学。南方朔先生的《抬杠》一文即深受本书启发。“抬杠”一词起源于北方习俗“抬杠会”，其词义衍生过程及与不同文化中相关说法的对照趣味颇多。中国章回小说中主帅厮杀前的预演程序为“叫阵”，而在《圣经》中，大卫王与巨人戈里亚的“隔阵对骂”、古希腊文中意指“语词奸诈”的“log-machy”、美国黑人社会的“仪式性对骂”，无不与所谓“抬杠文化”貌合神离，神合貌离。及至网络语文中的“跟帖”、社区语文中的“灌水”以及博客语文中的“扳砖”，混沌地说，大抵也都可归入广义的“抬杠语文”，算是一种网络版吧。在互联网上，“仪式性斗嘴”如今已日渐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嘴巴的假期”。

当然，尽管古往今来古今中外的“抬杠”有那么多相似乃至神似，但终究他是他，你是你。那些语速与腔调上的大同小异并不天然证明那湖丰润的口水会是同一种语言，而是相反。每位语词使用者不过仅止跋涉在语词万千义项的某个支脉中，并常像“小红帽”那样

越走越黑，越走越远，迷失回家的路。

《寻芳草集-绿原散文随笔集》

绿原/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盗火者文丛”之一。很多人说过，新中国以后，很多现代白话文学习者的学习过程，其实就是一个接受译者影响的过程，不无道理。不过，在此语境中所谓“译者”，更多是指绿原先生那一代人。现在的译者西文好不好不知道，中文好的不多。

绿原一生译述颇多，兼作汉诗。其译著中最著名的是歌德的《浮士德》。书中的一辑集合很多怀人之文，这类文字常最见性情。《一片无字的贝叶》中，作者怀念老友曾卓：“至人无梦。偏我活到一把年纪，每夜仍然少不了梦。梦和梦也不一样。在我梦里走进走出的，常不外乎几位陆续亡故的老友，其中亮相频率最高的要属你了。作为思念的变形和代用品，梦不由自主又无可奈何，恰似荡漾在遗忘之湖的一叶扁舟。早晨醒来，梦舟靠岸，你我照例又一次分别……”

如此怀人情景让人想起《我们仨》上部中那个逼真、神伤且漫长的大梦。再想到的，已是年少时无数青春之梦：美好，缥缈，迷乱，阳光，阴鹭。人生一头一尾大概都镶嵌着无数梦吧。不同的只是方向相反，调性不一。

《挥杆：工作、生活、高尔夫》

[美]盖伊·亨德里克斯/著

中信出版社

告诉富人要有平常心，告诉穷人要有上进心，这就是如今很多畅销书的“中心思想”。至于用怎样的平台或喻体表达它，各庄有各庄的高招儿。其模式化的部分不变，而其喻体的部分则花样繁多，让人眼花缭乱。

依照如此判断，这本书与“高尔夫”这种据说是由牧羊人发明的贵族运动基本没什么关系，与“比杆赛”(STROKEPLAY)或“比洞赛”(MATCH-PLAY)更属风马牛。在这类励志书中，咖啡、奶酪、鱼、熊、汤耗子或哈根达斯之类大都成为一系列老生常谈的托儿。

当然，对于这类畅销书而言，“托儿”的选择至关重要。被用来当“托儿”的，大多为洋玩意儿。放心，它永远不会是“豆汁儿”，更不会是“炸酱面”。遵循距离产生美感的基本原则，给中国的穷人们生产励志书却选择大爷小妹耳熟能详的香椿拌黄豆或东坡肘子，神秘感荡然无存不说，超出常理的阅读热情也便子虚乌有。

以此看来，所谓畅销书，其实就是写给穷人看的书。理由很简单，在这个世界上，富人太少了，穷人太多了。而也只有穷人才需要励志，而富人需要的则是裁减欲望。

黄集伟阅读笔记 七月 黄集伟 = 文

《隋唐五代社会生活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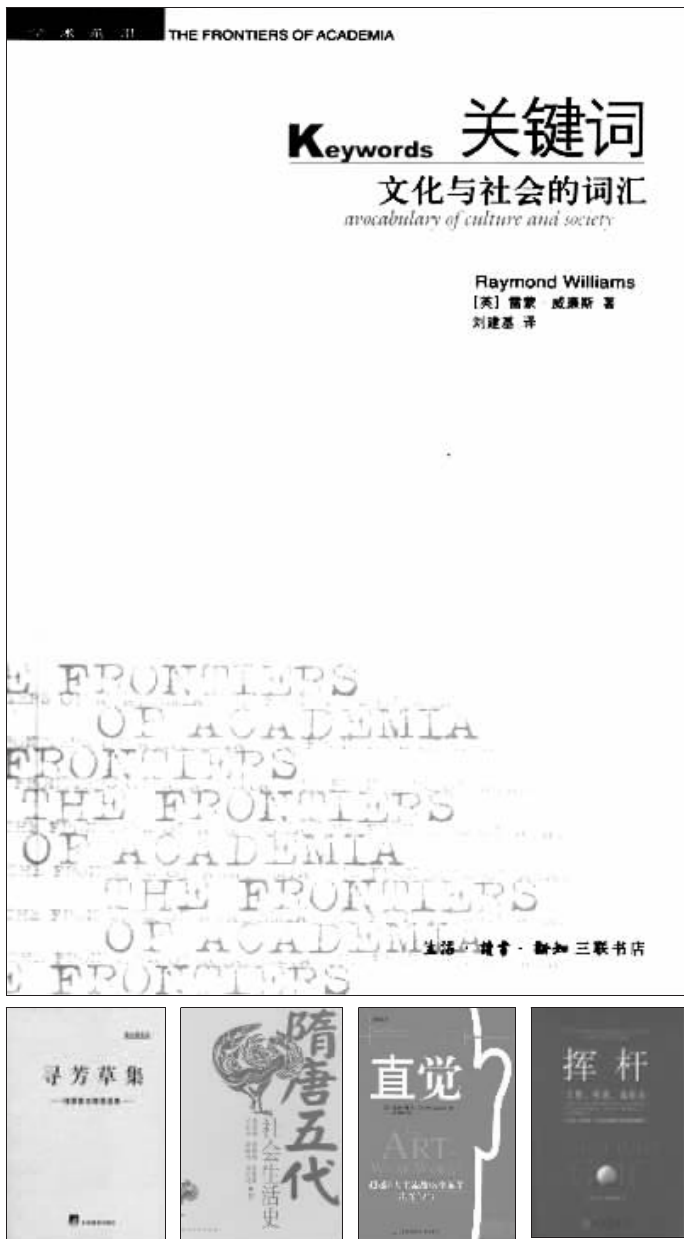
李斌城 等/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今天叫做“饭局”的那种交际活动在隋唐五代时异常发达。今天，越来越多的人选择“逃局”，原因很复杂。而花样单调，理由不足等，估计都是原因。本书中“宴会”一节记载说，在那时，光是皇帝的赐宴与会食就花样繁多……请注意，花样二字对于饭局，至关重要。

隋唐五代时，最为尊贵的一种“饭局”称之为“大”，时间长度多为三至九天，在全国城乡举办。大期间，百官庶民可恣意聚饮，歌舞嬉戏，并伴之以各色游乐活动，通常会乱到无法收拾。有一次，玄宗对高力士说：“吾以海内丰稔，四方无事，故盛为宴乐，与百姓同欢，不知下人喧乱如此，汝何方止之。”

老人家不懂的是，尤其对于庶民而言，狂欢就是狂欢，假使狂欢还要讲究节制与分寸，那叫代表大会，也就不是狂欢。相似的意思同样适用于今天的饭局。在饭局上用带刻度的烧杯一克克量着喝散啤，那近似于小白鼠试验，不是狂欢啊。狂欢的同义词就是那个乱字。不想乱，还是开会比较好。



唐代的时候已经有了类似于今天的“工作午餐”。当然，那时候不叫“工作午餐”，而叫“会食”，即大小官员在自己办公的地方一边用餐，一边商议政事。说起来，唐代的“工作午餐”还要得益于太宗慈悲。他发现上朝者退朝稍晚就要饿肚子，便赐饭，称之为“廊下餐”。后来渐渐成为一个格式，且吃且办的事情也日渐丰富，有“议政事”，有“观礼仪”，有“和僚友”，简直像个简易的吹风通气会，且公私兼顾。

当然，把这一套移挪到今天的饭局上也行不通。我甚至觉得饭局日渐寡趣的真正原因是因为有了万能的MSN，有了它，什么格式的文件都可及时共享，还可以爆炸、接吻、磕头和打屁屁，还要见面入“局”？有必要吗？

唐代有一种新传入的食品叫“毕罗”，是一种胡食，据称所谓“毕罗”与今天很多带馅食品非常像。其时有一种名为“樱桃毕罗”的毕罗，其讲究之处在于做好后，其馅里的樱桃“其色不变”。看来，MSN 惟一的缺陷是闻不到香味，而这也大可成为其下一步的科研重点攻关项目。果真有一天想约会，从 MSN 上奉献的那朵玫瑰在电脑那端忽就奇香缭绕，“饭局”也多半就要进入国博。■

惟有祈祷

王康 = 文

现代中国人至少有双重
因缘敬畏犹太民族。

仅仅数十名犹太人在短短数十年时间里,就从理论和实验两方面将在宇宙深处沉寂了数十亿年的基本物质力量释放于人世,不仅避免了一百万盟军士兵和两千万日本平民的生命伤亡,提前结束了中国抗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而且永远改变了人类的处境、思维和命运。由于犹太人所占比例过大,阿尔伯特·爱因斯坦、马科斯·玻恩、尼尔斯·玻尔、恩利克·费密、J.罗伯特·奥本海默等犹太科学家主导的现代物理学,曾一度被称为“犹太物理学”。

同样,由于卡尔·马克思的犹太血统,由于俄国革命的犹太背景,由于罗莎·卢森堡、梅叶勒夫娜·海尔夫曼、安娜·库莉赫鞭、贝拉·库恩、库特·艾斯纳等名震欧洲的犹太革命家惊人的殉道者般的牺牲精神,在整个 20 世纪成为中国和全球激进主义革命精神源泉的历史运动和世界思潮,曾一度被称为“犹太共产主义”、“国际主义”和“犹太布尔什维克”。

苏联操控的共产国际在上世纪 20 至 40 年代派驻中国的代表和顾问,也流淌着浓度甚高的犹太血流。

犹太人对中国和世界的启示性意义远远不止于此。

那个民族曾经遭受过如此漫长而深重的苦难。这个“上帝的选民”向世界各地流散迁徙的经历,似乎就是数千年里人间灾祸的路线图,似乎整个世界都在合谋排斥、驱逐、迫害、虐待、屠杀和灭绝犹太人,以致犹太人发明了四个恐怖的词汇,以音译形式直接进入各国语言: pogrom (排犹)、genocide (灭犹)、holocaust (屠犹)、ghetto (隔都)。这个从荆棘之途、骷髅之地泣血而来的古老民族,至今还在为自己的故土

和圣城流血。

正是这个人口从来不到人类百分之一的弱小族群,这个几乎在每一个时代、每一个国度都成为厌恶、嫉恨、诅咒、仇视和杀戮对象的生命-信仰共同体,这个纵贯五千年、散居五大洲的世界民族,却恰似浩瀚星空中最炫目、最惊心动魄的彗星,屡屡划破人类文明的漫漫历史长夜。

犹太民族贡献于世界的是一幅遮天蔽日的(民族)生命受难图,一座古老而簇新的精神圣殿,一群又一群冲破黑暗朝向黄金时代、穿越地狱走往天堂的圣徒和先知,一首又一首由全体成年男性低声吟唱的哀歌-雅歌-颂歌-圣歌。

《与上帝摔跤》以其悲怆的诗体语言和极度浓缩的散文笔法“平静地叙述”了犹太人及其音乐的特殊命运。作为第一位撰写犹太音乐的中国学者,铭道教授撇开“令人望而生畏的音乐技术分析”,将犹太音乐归汇到犹太民族充满苦难和奇迹的历史和风俗中去,将犹太民族长长的先知、圣徒、祭司、卜者、国王、英雄和诗人谱系,将他们一则则令人心碎的悲剧事故,笼罩在挽歌-牧歌的悲欣复调氛围里,白骨因之散化成月色,鲜血因之分解成晚霞,绵延不尽的生命的消殒,纷然熨帖成天国洞开的黎明之光。学术从谱例中退隐,专业在途述中升华,惟余性灵在追逐犹太历史和犹太生命潮汐的涨落……

这是一位年逾“知天命”之年的男子,为天下的“青年才俊”,为从未谋面、永相识的“后人”,为那些对这个世界百思不得其解却依然能承受、会感动、相信奇迹、渴望救赎的人们而写的灵书,掩卷之余,心灵不震撼、不怅然若失、不仰天长叹者,不是本书的知音,或已患上精神的白内障和心灵的老年痴呆症。

音乐的单纯与神奇,竟可以记录、表达和承载一个

民族几千年的生命历程。陈铭道教授以其轻度中风微微颤动的手指,为中国人拨动了进入犹太历史和心灵的琴弦,倾泻出感人肺腑的人类之爱,奔淌着对犹太人的深沉而纯粹的同情、倾心、敬重和祝福。

世界通常是一个逐渐解蔽的过程,偶尔有一次豁然开朗的爆发。中国人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心境走出自己的国度,这个边界分明的小小的星球,绝非看上去那样单调、枯燥,那样“不过如此”。真正激动人心的旅游,是关于人类精神生命的巡视;真正不朽的世界指南,永远导向一切生命的死而复生,永远等候着所有的民族都在由旋律和乐音构成的世界里复活。正如本书开篇第一段和结尾一段文字寄望的那样:“有一天,每一个犹太人终将意识到:没有犹太民间音乐的复活,就没有犹太民族的复兴,正如一个人没有心脏不能活,一个民族没有民间音乐也不能活;到了这一天,复兴才会成为一种现实。”

最让我心生感动的,是洋溢全书的某种类似宗教情怀的谦卑、忧伤和神秘的心迹,以及对人类受难和牺牲的宿命般的庄严、肃穆,这使我不断想到爱因斯坦这位犹太人特有的目光和文字:

我们所能有的最美好的经验是奥秘的经验。它是坚守在真正艺术和真正科学发源地上的基本感情。谁要是体验不到它,谁要是不再有好奇心也不再有惊讶的感觉,他就无异于行尸走肉,他的眼睛是迷糊不清的。就是这样奥秘的经验——虽然掺杂着恐怖——产生了宗教。我们认识到有某种为我们所不能洞察的东西存在,感觉到那种只能以其最原始的形式为我们感受到的最深奥的理性和最灿烂的美——正是这种认识和情感构成了真正的宗教感情。■

“与上帝摔跤”的人

傅显舟 = 文

与上帝摔跤的人是一个传说:犹太人雅各在雅博渡口与上帝较劲比摔跤,赢了上帝,上帝却报复他抽了他脚筋,使他成了跛子。陈铭道先生讲述犹太文化与音乐的一本书用《与上帝摔跤》为主标题,“犹太人及其音乐”为副标题,意味深长。

犹太文化与历史本身给今人太多的警示与反省。这本书写得海阔天空,牵涉犹太宗教、法律、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内容,也写得火力集中,聚焦于犹太人及其文化的命运;书写得生动活泼,也写得形神兼备,雅俗共赏。本书不专谈音乐,而是先谈文化,后说音乐;在理清犹太人社会文化起源、变迁之线条后,顺便剖析介绍了犹太音乐。

至于犹太音乐有什么内容,有些什么特色,本书的探讨与结论较为谨慎。犹太音乐内容包括宗教与世俗的两个面,与其他民族没有太多的不同;属于犹太民族的乐器没有几件,或者干脆说只有一种管乐哨法尔;音乐形态的特征也没有几条,书中强调的关于犹太音乐四音列特征,最后所举的谱例,也未必能完全证明那就是犹太音乐的特点。按照作者的观点,什么音乐一定是犹太音乐,也未必是一件说得清楚的事情。说不清楚的事情何必去下结论?留给后来的学者去完成好了。不必研究什么就一定要拔高对象,认为其独具特点,不可代替。这可能是作者的另一层考虑。而如果纠缠那些说不清楚的音乐本体特征,有几个人会有兴趣把书读下去?

老陈多年前着手此书,我并不看好,觉得以色列音乐不像日本、印度、阿拉伯音乐,真是有东西可写,真是有特色可描绘,故颇不以为然。其间他脑血栓大病一场,真的重重“摔了一跤”,与上帝擦肩而过。他康复后未停笔,接着写,终于写出一本让大家惊讶的好书。这种挚着浸润于书中的文字,体现出一种独立思考、独立判断与独立批判之品格,正是国内学术界常常缺失的品格。■



《与上帝摔跤——
犹太人及其音乐》
陈铭道/著
民族出版社 2005 年 1 月

舞动的历史

殷练 = 文

《中华舞蹈图史》

王克芬/著

台湾文津书局 2002 年版

在斯德哥尔摩的远东文物博物馆的展馆一角,摆放着几个东方舞俑,一旁的说明寥寥无几,人们只知道它们来自远古东方,但没有人知道它们的确切年代。它们的动作姿态以及服装饰品承载着什么样的文化信息,在很多年里也无人知晓。当这几个舞俑在异乡的角落踽踽而立多年之后,一位裹挟在观光客中的中国老学者解读他们的“身世”,孤独的舞俑从此回归到了自己的历史之中。多年后,当中国著名的舞蹈史学家王克芬先生在回忆起发现这些舞俑的那一刻,还是掩不住的欣喜和激动。

这些来自大唐盛世的舞俑图片终于辗转到了王克芬先生的手中。而这些图片和图片背后的故事不过是这部极其珍贵和独特的舞蹈史书中的一页。在这部《中华舞蹈图史》多达六百多幅的图片中,几乎每一张图片的背后都有着这样一个鲜为人知的生动故事。

的确,在舞蹈史学家的眼中,每一



个静静的舞俑都承载着一段历史,每一个凝固的动作都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甚至每一片飘起的裙裾都是一串串独特而神秘的历史符号。在半个世纪的舞蹈史研究生涯中,王克芬先生已经练就了一双独特而善于发现的眼睛,她从浩瀚的历史文献、舞蹈文物及古代舞蹈的当代遗存中,梳理出了中国古代舞蹈发展的脉络,勾画出了各个时期舞蹈的风格气质、审美情趣等等。用心灵静静地聆听历史的回响,那些已经飘逝的舞蹈历史片段在她的书

中渐渐复活,并变得越来越生动而感性,历史的舞者在她孜孜不倦的求索中,还原成了一个个苏醒着的鲜活的生命。

在这本书中,你可以看到中国原始社会最古老的舞蹈文物图片,从五、六千年前中华民族扭动的舞姿触摸遥远的历史;你也可以从众多的诗句,如“拂水低徊舞袖翻”(杜甫诗)、“舞袖慢移凝瑞雪”(陈标诗)、“翩翩舞袖双飞蝶”(白居易诗)等等的文物图片形象中体验绚丽多姿、光彩夺目的大唐盛世;你可以从日本、朝鲜、韩国等亚洲国家的舞蹈文物图片与中国舞蹈的承袭线索中,体味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与渊源流长;你还可以从艺术宝库之称的石窟壁画、造像中的仙乐飘飘及人间乐舞的图片中,感悟民族之美与人类文明的神秘与奥妙。历史的画卷如此感性而生动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其绚烂与纯净都无不抚慰着现代人浮躁不安的灵魂。

一位叫瓦尔特·索雷尔的艺术史学家将舞蹈艺术形式称之为在各种历史与人类力量的作用中的主要角色。他认为,“人类的发明才能和创造精神正是通过这种形象(舞蹈)得到揭示的。”沿着人类舞蹈史的发展脚步,人们能体验到作为人类最原初、最本能、最直接、最纯净的生命表现形式——舞蹈,一经产生便成为人类在漫长的生命发展历程中的忠实旅伴,它陪同人类从蒙昧走向文明,从混沌走向智慧。而伴随着古老的中华文明而生的中华舞蹈,无疑为我们考察和探索中华民族的生产劳动、生活方式、宗教信仰、民情民风、伦理道德、审美情趣以及政治文化等等提供了广阔的视野。

用舞蹈来书写历史、呈现历史,这样的一部史书无疑会因其充满了内在的逻辑性和形象逼真、引人入胜而极具说服力和可读性。更难能可贵的是,该书精美的图片和均衡的纵览相得益彰,其六百多幅舞蹈图片将中国古代文化、社会政治生活串联在一起,编织成了一幅幅跳动的舞蹈历史,使其成为国内外最为翔实、最具参考价值的中华舞蹈研究和艺术研究的巨著。

一本《中华舞蹈图史》,一部鲜活的中华舞蹈艺术史,它不仅能为希望探寻艺术秘密的人们提供一些寻觅已久的答案,更重要的是它能把人们引向一个迷人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中,你可以以史为据,也可以恣意想象,直到触摸和感悟到中华民族在漫长历史中那神秘而瑰丽的艺术征程。■



书籍影响世界

阿尔封斯·都德 Alphonse Daudet, 1840—1897) 法国小说家,毕生从事创作。以短篇小说及描写法国南方风光的故事闻名于世。1866 年以短篇小说集《磨坊书简》引起文坛注意,两年后,长篇小说《小东西》又获巨大成功,赢得著名小说家的声誉。1873 年发表的《星期一故事集》中《最后一课》《柏林之围》成了世界短篇小说中的名篇。代表作品包括《故事选》《冬天故事》《达拉斯贡城的达达兰》《富豪》《不朽者》《萨芙》等

苏童 = 文

《影响了我们的二十篇小说(外国小说读本)》

苏童/选编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5 年 5 月

孩

子们打开他们的百宝箱,箱子里的东西不一定是别人心目中的宝物,但一定是箱子的主人所珍爱的,一堆杂物,因为凝结着收藏者的感情和记忆,自然闪烁着珍奇的光芒,百宝箱便也有了毋须商榷的价值,现在我做的这件事,其实就是把自己的百宝箱从床底下拖出来,打开的时候有一种强加于人的粗鲁,一意孤行的执着,好在里面的都是小说,不读不知好歹,就像孩子们用天真烂漫绑架别人的目光,选家用自己的记忆绑架别人的阅读时间,我想这是现实世界上惟一可以容忍的绑架了。

当然,关键词仍然是影响。

影响——一个意味深长的词汇,加西亚·马尔克斯对胡安·鲁尔弗的《佩德罗·巴拉莫》可以倒背如流。他从来没有掩饰过他对后者的狂热。“雷德利亚神父在很多年后将会回忆起那天晚上的情景。”这是《佩德罗·巴拉莫》中的某一节的开头,大家是不是觉得眼熟?当然,这令人想起著名的《百年孤独》的开篇部分,比较具有戏剧意味的是,人们通常把这著名的句式当做马尔克斯的注册商标,却不知道这是一个伟大的作家对另一个伟大的作家的脱帽致敬。

“发现胡安·鲁尔弗,就像发现弗兰茨·卡夫卡一样,无疑是我记忆中的重要篇章。”马尔克斯在谈及胡安·鲁尔弗时强调了一个前辈作家如何占据了一个后来者的记忆。记忆,散漫的或者有条不紊的记忆,这恰恰是一个作家对另一个作家产生影响的本质体现。

《胡安·鲁尔弗中短篇小说》出版于 24 年前(当时的书价为 0.79 元。如今是再也找不到有如此性价比的小说了)。我读这本书的时候还很年轻,无端地蔑视传统,对于当时最新的翻译小说的阅读更像是一次次的技术解密工作。但是《佩德罗·巴拉莫》带给我的是震惊,震惊之后是一种崩溃感,这是一个文学青年在遇见一座奇峻的小说高山之后的崩溃,在我看来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小说文本。不知道是写作者的思想还是回忆在飞翔,不知道是写作者的身体还是心灵在穿越,穿越一个个村庄,“这个村庄充满了回声”,“有的村庄具有一些不幸的味道”。穿越一个个传奇的佩德罗·



一生的文学珍藏

巴拉莫(这个英雄是幽灵还是一个活人?)我所有的生活常识和文学常识都无法给出明确的答案,在这样的作品中,试图勾勒什么是徒劳的,因为文字的魔力使人晕眩并且失去了抒发读后感的能力,《佩德罗·巴拉莫》是一部无界线的小说,叙述与想象没有界线,死者和活人没有界线,真实和虚幻没有界线,时间和坐标都被消灭了,被消灭的还有我迷信的定向思维。从此我知道小说的空间不是文字与世界的简单二维空间,它是一个神秘的不可预设的多维空间。

有点酸楚,有点沉重。生活和人的灵魂同样充满褶皱,褶皱中有严重的挫伤,有好多暧昧不清的地方,作家要指给人们看。而所有来自阅读的惊喜,终将回到不知名的读者身体内部或者心灵深处

这里选的另一部中篇小说《伤心咖啡馆之歌》,也事关二十年前的阅读记忆。我上高中时用有限的零用钱买了一本《当代美国短篇小说集》,读到了李文俊先生翻译的这篇《伤心咖啡馆之歌》,我至今说不清楚我对这部小说的偏爱是出于艺术评判标准,还是其他似是而非的标准。偏爱也许是不讲道理的,可以怀疑的一点是:我对那类仿哥特式小说有本能的兴趣,这是

一个曾经钟情于侦探推理小说的青年人觉醒之后的合理延续。小镇酒馆“有钱的爱密利亚小姐”、“贫困潦倒的罗锅表哥李蒙”组合成一个充分满足猎奇心的舞台(尽管现在看来那是一个典型的美国南方小镇的舞台)。百叶窗开开合合,室内光线阴暗,女主人“脸上有一种严峻粗犷的表情”,而且“有点斜眼”,性格乖僻对人充满敌意,男主人是个无家可归的可怜的驼子,他甚至不知道自己的年龄,舞台边缘站着永远无所事事飞短流长的小镇人。这样的舞台,上演什么样的戏合适?当然是一出阴郁怪诞的神秘恐怖的戏(多少带有一点血腥味的),哥特式小说的圈套诱惑你怀着低级的向往期望着什么,但渐渐地你发现所有的主题都被巧妙地偷换过了,阴郁怪诞的是爱密利亚小姐对驼子热烈的爱情,神秘恐怖的是驼子李蒙表哥的内心世界,没有谋杀,但有比谋杀更加残酷的羞辱与背叛,没有血腥味,但有比死人更伤心的结局。我想这也是英年早逝的卡森·麦卡勒斯小姐给这部小说取名的由来。

巧合的是我喜欢的威廉·福克纳的短篇《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也是被认为带有哥特式小说风格的,我不得不承认它与《伤心咖啡馆之歌》读来有息息相关之气,从写作时间上推断,《伤心咖啡馆之歌》有可能是受了这一朵“玫瑰”的影响,但这不是我要探讨的问题,我一直想努力和读者一起弄清楚的是:一部好小说的外部动力可不可以是二流的甚至不入流的小说?众多热爱福克纳的人会

下意识地反问,为什么把低级的哥特式小说与伟大的福克纳相比呢?我打赌这不会是福克纳先生本人的反应。最优秀的作家在写作上可能是最民主的最无成见的,不耻下问不仅是人生态度也是一种艺术态度。《玫瑰》区别于福克纳其他波澜壮阔深刻沉重的长篇巨制,显得那么精致易读,在我看来,与其说他借助了哥特式小说阴沉怪诞的叙述气氛,不如说是这类小说中人物推开沉重大门的动作给了他非凡的灵感,于是他在短短的篇幅中完成了两个推门动作,一扇门是爱米丽小姐居住的破败宅屋的尘封之门,还有一扇门是爱米丽小姐的内心之门,这么直接,这么精妙绝伦,我们最后看见的是比《伤心》的结尾更加惊人的场景,看见爱米丽小姐尘封四十年的房间,死去多年的情人依然躺在她的床上,看见“一绺长长的铁灰色头发”,爱米丽小姐其实也是躺在那儿的,她的内心一直孤独地躺在那儿,是一颗世界上最孤独的女人之心。读哥特式小说是要让你害怕的,《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当然也让人害怕,不过由于圣手点化,恐惧不是因为恐惧引起,是为了一种尖锐的孤独和悲伤。

说到孤独,孤独的不可摆脱和心灵的自救是肉眼见不到的现实,孤独是人类困境中最大的沼泽地。优秀的文学家关注着这样的现实。霍桑的《威克菲尔德》这个短篇带给我的震动不比他著名的长篇《红字》弱小,一个离家出走的男人,他的隐秘的栖息地竟然是离家不远的另一个街区,一个离家出走的人,每天可以路过家门,暗中

观察家人的生活,这样的人物设置首先就先声夺人了。这个男人要干什么?他恐惧什么?逃避什么?离家出走的直线距离不到千米,反而让人有兴趣丈量别的更多的距离,比如离开社会的距离,离开道德的距离,自由的最佳距离等等,以我的理解,这是一个孤独者极其智慧的自救方式,躲在近处,失踪二十年后再回来,这几乎是某些人在暗夜里的一次胡思乱想,霍桑在一百年前就将它昭示于天下,写出来,竟成了一部鬼斧神工的小说。霍桑对人的困境的解决方法当然不可复制,在博尔赫斯的《第三者》中,相依为命的贫苦兄弟不巧爱上了同一个风尘女子而不能自拔,为了免于不坚固的爱情破坏坚固的兄弟之情,他们的选择是摆脱爱情,摆脱的方法却是充满罪恶的,他们杀了那个女人。也许读者会惊讶于优雅的博尔赫斯写出如此暴力的结局。而且他让令人发指的暴行在小说里顺理成章,成为人物的最后的出路,我也觉得意外,但我想这是因为最优秀的作家不给自己设置任何法令吧,他无须回避暴力,因为他不宣扬暴力,他所关心的是人的挣扎、人的境遇,以及种种有效或无效的自救方式。

作家总是会用作家的手段表达人

类境遇,比如象征,比如反讽,无论它多么古老陈腐,多么容易让人识破,却像是农夫手中无法抛弃的农具。卡夫卡的《饥饿艺术家》广为人知,自不必多说。在贝内德蒂的《阿内西阿美女皇后》中,失去记忆作为一次性象征贯彻始终,极其有效地渲染了人的困境,而集体性的失忆(以身份不明的美女和心怀鬼胎的嫖客为代表)似乎可以看作一次对人的情感统计,尽管这统计消极到令人沮丧。更加直接而令人不快的统计发生在迪诺·布扎蒂的《七层楼》中,那个意大利作家干脆用七层楼统计一切,下降是他对人的处境的所有看法,由此,他异常麻利冷酷地把人物一层层推下去,从七层推到一层,直至推向深渊,而君特·格拉斯的《左撇子》相比之下显得孔武有力,但我们看到两个矫正左撇子的人最后是用枪解决问题时,我们不幸地回到了象征手法的基本温习中,左撇子到底是谁,用枪解决的到底是哪些问题,谁的问题?这一问也许多余,问小说的意图,有时候问得人忧心忡忡起来,也不知是好是坏。惟一确凿的是象征的力量永远不死,或许可以说,没有落伍的艺术手段,只有落伍的使用者吧。

貌似平静的世界潜藏着太多不平

常的细节,而平常与不平常都不可忽略,好多作家都在记录这样那样的细节,它们来自于所谓的日常生活。记录因记录者的姿态和性格各异,你会闻到各种各样的生活的气味,各种各样人的气味(包括体味)。细节永远是深入人心的。这类的小说帮助我们回味他人的生活,也回味自己,帮助我们更深地认识他人,也认识自我。我本人一直钟爱的美国作家雷蒙德·卡弗就是这么个传达生活的气味的人。卡弗对当代普通人生活有着细如发丝的洞察力和一种天然的平等温暖的视觉态度,他的同情心和他的简洁朴实的文风一样毫无矫饰。《马骰头》里的霍利茨一家破产以后从头再来,等待他们的依然是破产,一家人再次迁徙,留下一只马骰头,散发着无比悲凉的气息,掩卷之后,人走茶不凉,读者是可以清晰地闻到那种气味的,是令人心冷的铁的气味。有点酸楚,有点沉重。生活和人的灵魂同样充满褶皱,褶皱中有严重的挫伤,有好多暧昧不清的地方,作家要指给人们看,有的像雷蒙德·卡弗用粗壮有力的手指,有的则用细长灵巧的手指,比如加拿大女作家门罗,她的《办公室》只是记叙了一个家庭妇女租用一间办公室写作的故事,一个

女人与一个男人,几天交往,如此日常化的叙述手段,却像外科医生一样精准地翻开那些褶皱,让我们看见了别人或者我们自己深藏的污垢。与《办公室》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有普里切特的《潜水夫》、约翰·契弗的《巨型收音机》等等,它们都让我们看见了某些被遮盖的事物,让我们听见了寻常生活中某些不寻常的回声。

作为一个选编者来说,我已经说得太多。或许小说没有写什么的问题,只有怎么写的问题,而怎么写对于作家来说是一个宽阔到无边无际的天问,对于读者来说是一个永远的诱惑。所有来自阅读的惊喜,终将回到不知名的读者身体内部或者心灵深处。另外,就像童话之于我们的儿女,我一直觉得短篇小说很像针对成年人的夜间故事。深夜挑灯,在临睡前借助一次轻松的阅读,摸一摸这个世界,让一天的生活始于平庸而终止于辉煌,多好。当然阅读从来没有时限,《圣诞节忆旧》中那个善良而孩子气的老妇人在十一月的早晨醒来时会大声对孩子说,这是做水果蛋糕的好天气!如果我们在“一个树叶光光没有小鸟的冬天早晨”醒来,为什么我们不能说,这是读小说的好天气?! ■



三立漆
salle paint

隆重招商!

2nd Generation
第二代
国家免检产品

新产品、新形象、新服务。三立漆第二代产品将以全新的面貌隆重登场,现三立漆北京分公司面向北京地区招商。

选择三立漆的七大理由:

1. 涂料行业首批国家四大免检产品之一,给您足够的信心保证;
2. 大、中、小型专卖店,公司为您量身定作,让您轻松创业;
3. 营销、策划、技术培训一步到位,尽显专业水准;
4. 完美的专卖店加盟程序,与您共赢的经营理念,更大化保障经销商利益;
5. 特有的专卖店形象,更显三立漆独特个性;
6. 专业化的管理,最大化的利润空间,让加盟者无忧投入,放心赚钱;
7. 前十家加盟商,免代理费。

诚邀新一代具有品牌营销战略智慧的伙伴垂询,区域代理,地区分销商等相关事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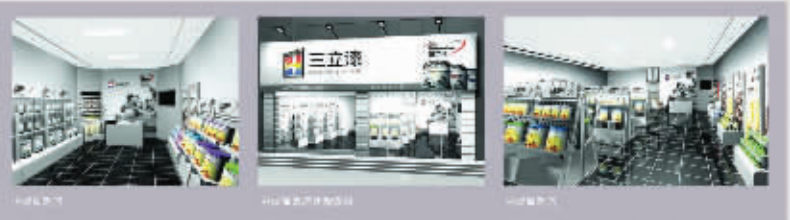
泉州市三立漆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地址:天通东苑三区56号楼6门

招商热线:010-61747100 61765380/81

传真:010-61747588

网址:www.salle.com.cn



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



组织机构代码证



营业执照



税务登记证



银行开户许可证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天瓢之雨

易晖 = 文

对于社会生活来说，市场化常常能起到“解魅”的功效，比如对文学创作。市场化带来文学创作和出版的开放与民主，使得人们——尤其是那些文学青年、文学少年们——对创作——尤其是长篇小说这种大型文体的创作——正在失去应有的虔敬和难度意识。利益的巨大诱惑以及市场的推波助澜，使得文学新人把创作长篇小说当成王朔说的“码字儿”，当成一项替代去公司上班或去学校听课的“营生”，大量涌进长篇小说的创作领域，导致近年来长篇小说数量的猛增，导致其整体质量的下降，也败坏了我们的阅读胃口。

在这样一种文学环境下，笔者读到了曹文轩先生的《天瓢》，这是一本令人耳目一新的书；一本让文学阅读回到其应有位置——生命感悟与审美愉悦——的书；一本会让文学新人们领悟文学的魅力、境界和创作姿态



《天瓢》
曹文轩/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5 年 3 月

东，他们的童年经验、成长历程是如何丝丝缕缕地渗透进他们成年性格与生活，他们从童年开始的爱恨情仇是如何隐秘而顽强地影响着两个人的关系以及他们的命运。当然，这绝不是说作者在塑造人物时是个人性观上的弗洛伊德主义者——一切还原到童年经验，作者同时是把人物放在环境当中来刻画。这里的环境是多层的，既有主人公生于斯长于斯的具体的生存环境，又有现代乡村中国血缘、家族、阶级、阶层的历史变迁，还有地理意义上独有的文化环境——一个不断出现在曹文轩小说世界的小型“油麻地文化”。这样，作品便在历时与共时的立体空间塑造出性格独特、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

以巧胜拙，意味着它的取胜不在“写什么”，而在“怎么写”。用批评家李敬泽一句很俏皮又很到位的话说，是一部文学/文化的“当权派”写的小说。确实，《天瓢》展现了作者深厚的审美功力和独特的风格追求，从而树立了一个不容混同、无法模仿的艺术高标。

表现这些声色情欲时，既细腻入微，又有一种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其实事在生命与性，其指归在人情与美——生命之美、生活之美、人情之美、自然之美。这种美首先是艺术的、精神性的，在对自然与生命之实的文学转化（通过情感与精神的投入、物象的描绘、想像的挥洒、语言的锤炼、意象与意境的营造）中喷薄而出，又因为与真（生活的真实、写实）的结合、融汇而不虚弱、虚无，获得涵纳人生与万物的力量。

记得诗人任洪渊先生曾以诗的方式慨叹历史与文化对语言和人类想像力的束缚与压榨：

在孔子的泰山下/我很难再成为山/在李白的黄河苏轼的长江旁/我很难再成为水/晋代的那丛菊花 一开/我的花朵/都将凋谢（《女娲的语言》）

而《天瓢》则在以小说的方式“词语击落词语”，追逐着艺术与想像力的“自己的地平线”。于是我们读到作品对天、地、人、物的无边

这雨在走进故事、走进形象、走进“油麻地”的同时，也走出了文本，唤起又击落杜甫的“春雨”、李贺的“红雨”、洪升的“梧桐雨”、戴望舒的“丁香雨”……它还走进了我们读者，在此意义上，阅读变成了对自然人间的饱览，对艺术这一“第二世界”的体察，对无数文学文本的记忆与刷新，对心灵的擦洗和情与美的孕育

的书。

不是说作品的视野多么宏阔、思想多么深邃、结构多么繁复，恰恰相反，这部小说采取一种以巧胜拙、四两拨千斤的写法。其主题和结构是单纯的、省净的。小说的中心人物就那么三两个，由农村孩子成长而成的乡村干部杜元潮、邱子东，以及他们共同的朋友程采芹，作品内容也围绕他们的爱恨交织而展开。在我们这个有着渊厚乡村传统的文学国度，这样一种立意和思想内容没有，也难有太多独特之处。我们甚至可以猜测作者在构思之初，就清醒地意识到作品的写作难度，但我依然要说这是一部在当代文坛有着独特价值的作品。

熟悉曹文轩创作的读者都知道，此前他是个功成名就的儿童文学作家，对少年成长与乡村世界的专注和出神入化的刻画，使得他的少年小说达到一个突破性的文学高度，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视儿童文学为“小儿科”、难入纯文学殿堂的陈见。因此，对少年记忆、成长经验等微妙、复杂的人生命题有着丰富而独到把握的作者，在转型创作成人小说的时候，自然会熟练地利用这笔取用不竭的文学财富。这就是说，他在构建作品的形象系统时，贯穿着从童年到成年的整体人生观。这并不仅仅表现为作品的时间跨度，从主人公的童年写到成年，而更是一种共时性、空间性的人性把握。我们读到杜元潮、邱子

东在塑造人物上，作品同样在写人的吃喝拉撒性，同样表现他们的欲望、激情、爱、恨。作品不乏表现人物的情与性，阴谋与暴力，以至女作家徐坤把它看成一部“情色小说”。文艺史上，柏拉图曾极力贬低诗（艺术）与诗人，认为诗会刺激狂热的情感、败坏世道人心，而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则标举艺术，认为诗能使情感得到宣泄和净化，从而具有教化功能。或许我们可以说，师徒俩都只论及问题的一面，艺术从来都有好与坏之分，好艺术与坏艺术会产生截然不同的作用。当下大量小说为迎合某种低级趣味，大肆渲染鄙俗、肮脏的情欲与物欲时，《天瓢》却逆流而上，在

无际而又深邃精微的描写，读到那包裹住又清洗出杜元潮、邱子东和程采芹们以及“油麻地世界”的无数场雨。这雨在走进故事、走进形象、走进“油麻地”的同时，也走出了文本，唤起又击落杜甫的“春雨”、李贺的“红雨”、洪升的“梧桐雨”、戴望舒的“丁香雨”……它还走进了我们读者，在此意义上，阅读变成了对自然人间的饱览，对艺术这一“第二世界”的体察，对无数文学文本的记忆与刷新，对心灵的擦洗和情与美的孕育。

读这样的小说，是要凝神定气，如品茗一样咀嚼滋味的，而它也一定会让你凝神定气，如林黛玉在读《西厢》时所说，让你“余香满口”。■

Editor's Choice

本期荐书

《谁是罗兰·巴特》

汪安民/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5月

罗兰·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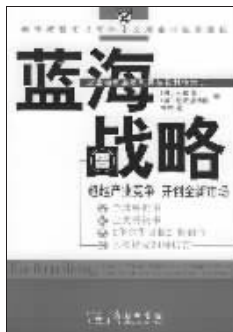
特在他早期的《神话学》力图发现现象和事实背后的真相。比如,在其中的《度假的作家》中,对媒体上刊登的作家纪德度假的闲暇照片,巴特分析认为,这张照片的真实意图,乃是作家实质上并非一个闲暇之人,恰恰相反,作家应是超凡的、独一无二的。媒体刊登的是名人的日常生活状态,一个与常人无异的休闲方式,但新闻媒体展现名人的这种平凡角色并非是将名人“解神秘化”,实际上媒体的这种努力正是将名人超凡化的一种方式。



《蓝海战略:超越产业竞争 开创全新市场》

W.钱·金(金昌为) 勒妮·莫博涅/著
商务印书馆,2005年5月

欧洲 Insead 商学院教授金昌为提出的蓝海战略开创了一个新时代,让我们从迈克尔·波特的竞争思想中走出来。金昌为试图超越基于竞争的战略思想,他认为:“要想在未来取胜,就必须停止与其他竞争对手间的竞争。打败竞争对手的惟一办法,就是停止那些试图击败竞争对手的做法。”他的意思是说,企业不应该在现存的产业、已知的市场中竞争,而应该通过价值创新去发现那些还不存在的产业、未知的市场空间。书中他对如何实施蓝海战略有详尽描述。



但另有一个细节值得着重指出,因为它虽小却可能对我们的战略思维产生非常深刻的影响:我们进行战略分析的基本分析单位不应该是过去的人们惯用的企业、产业,因为没有永远卓越的企业,产业的范畴也在不断变动。“战略行动”(strategic move)才是最佳分析单位,它通常指推出一项开辟市场的主要业务项目所涉及的一整套管理行动和决定。

《奢侈的概念:概念及历史的探究》

[美]克里斯托弗·贝里/著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5月

克里斯托弗·贝里分析,三种相互矛盾的效应影响着奢侈品的消费:“潮流效应”,即由于他人消费某些产品而导致需求增加,如时髦的东西;“势利效应”,即由于他人消费某一个特定产品而导致需求减少;“凡勃伦效应”,即由于价格高而不是价格低而导致需求增加。这三个效应可以拿来判断我们会不会成为奢侈品的拥趸。看来我注定不是奢侈品的消费者,因为我对这三种效应都没有反应。



《职场金庸》

沈威风/著

东方出版社,2005年4月

首先申明,这本书格调似乎不高,不光是因为它是谈武侠、金庸,而且它的封面上竟然有“职场修炼秘笈”字样。不过,熟读金庸的我怎么可能错过这本书?而且它又是在我所熟悉的商业、组织情境中重新阐释金庸人物——其实不能算是阐释,实际上是胡说。当然,胡说自然有胡读的乐趣,漫画《呆伯特》和《关于工作这件事》读者获得乐趣肯定超过正统管理著作。



这本书是本消遣的小书,但消遣之处倒也显出一些“小智慧”。比如菲奥瑞纳非要合并惠普和康柏,她在今年初被董事会请走的时候,惠普很不客气地说,她根本“不懂做生意”(She just wasn't very good at running the business)。合并对公司无益甚至有害,如果不是合并,菲奥瑞纳的名气怎么可能爆出商界之外,她是合并的最大受益者。

《焦点不太准:卡帕二战回忆录》

[匈牙利]罗伯特·卡帕/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5月

罗伯特·卡帕是二十世纪最伟大

的战地摄影记者,《焦点不太准》是他的二战回忆录。虽然冠名以回忆录,回忆他随盟军转战大西洋、北非、欧洲的经历,但他讲故事时多半是作为一个小说家。



在北非,卡帕自己意外成为别人镜头中的模特。在阿尔及利亚荒凉的沙漠中,卡帕迫不及待地奔下车找厕所,他奔跑一丛仙人掌旁,却在旁边发现一个木制小路标,上书:“ACHTUNG MINEN!”(德语,小心地雷!)卡帕丝毫不敢动了,也不敢后退,“因为第一次没能爆炸的地雷现在可能已经改变了主意。”卡帕只得对司机大喊大叫,让他去找排雷的人。几个小时后,司机回来了,带来了一个扫雷班和《生活》杂志的一个摄影记者。他们排雷的时候,《生活》杂志的人一个劲地拍照,因为盟军的进攻已经停止,这个镜头成了当天最引人注目的照片。

《再造宏基:开创、成长与挑战》

施振荣/著

中信出版社,2005年5月

施振荣说:“我的品牌是失败!”而他应该是最成功的亚洲企业家之一。施振荣最值得借鉴的地方或许正是,他从来不讳言失败。在这本相当坦率的、完全展现他的风格的书中,施振荣写道:“尽管我也许对过去种下的因结了一今天的果无法认同,却也必须‘认了’,但是,我不认命于未来。”接下来他写下了最关键的话:“如果不对过去认栽,却对未来认命,就永远无力感。”



施振荣是个“认输的赢家”。

《秘密与谎言:直面时装设计大师》

[英]苏珊娜·法兰克尔/著 钟和晏/译

吉林美术出版社,2005年7月

时装设计师是什么样的人?我对时装没有任何兴趣,但我一直很好奇,那些设计师头脑里装的是什么,他们为什么能够创造出如此怪异而美丽的

衣服?噢,对了,他们创造的其实不是衣服,他们谈的是观念,这是我喜欢

的。我们听听汤姆·福特怎么说的性感的:“如今美的标准变得如此紧张而刻意,尤其在美国。我丝毫不觉得那就是性感。性感的人通常是平静惬意的,即使在情绪低落的时候也能和自己达成和谐。”他说的不只是衣服,也不只是在说性感,和自己达成和谐,那不就是人生中最美妙的时刻。



《天天向上——企业绩效管理:从规划到实现》

杰夫里·R·罗德克/著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5年4月

这本书将提高业绩和树立责任两个话题紧密联结在一起。美国从2002年开始连续出现的丑闻使得公司面临更严格的监管,中国也正出现相似的状况,公司行为受到广泛的监督,这本书试图寻找这样一个问题的答案:在更严格的财务监管体系下如何达成实现业绩突破?



《直觉:超越3大主流战略学派的决策智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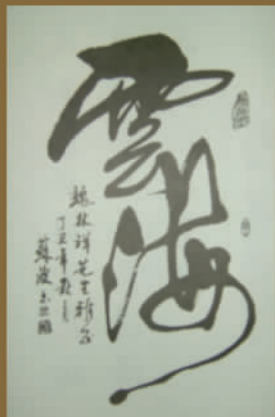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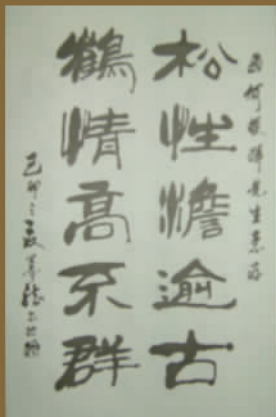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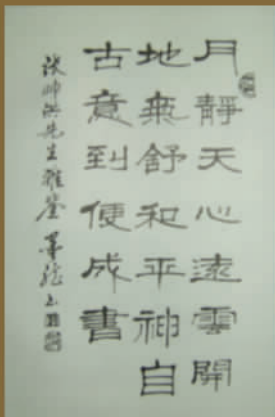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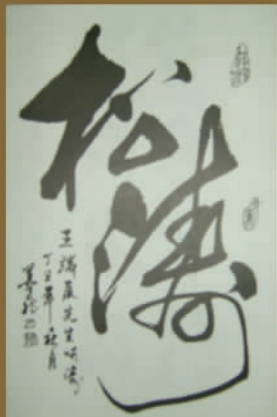
[美]威廉·杜根/著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年6月

“既然你无法做你想做的所有事,那就做你能做的事吧。”达芬奇说,他在科学和艺术两个方面都有惊人的成就。他的创意方法与传统智慧相反:传统智慧说凡事适于远景、目标或愿望,但达芬奇认为,你应该“想你能做的事”,也就是说,你应该先看看你能做什么,这样你才能知道确定什么目标。这本书谈的是战略,但和在别处读到的一个关于人的管理观念有着相通之处:管理是解放(release),而非转变(transform)。

方军=文

中国 ● 北京 ● 墨龙轩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十里居67号千景画苑《墨龙轩》画廊 邮编：100016
(燕莎向东1000多米，东风北桥东南边第一家二楼)
账号：4101800-0188-0074678 (户名：伏佐锋)
中国银行北京市朝阳区支行燕莎中心分理处
电话：画廊010 64365169 (9:00-20:00)
住宅：010 64363853
移动：13552962806



《墨龙轩》画廊在北京开张不足两年，竟被众多媒体炒得沸沸扬扬。它是中国著名书法家苏波先生开辟的书画园地，主要展示个人作品，也有少量名人字画。这里的书画价格合理物超所值，所以回头客很多，还带来不少新客户。苏波先生的心态很好，他认为只要把画卖出去，挂在千家万户便知足了。至于价格，能高则高，能低便低，皆亦然乐手。故任何一个经济阶段的人都能在他们那里买到字画。

他为书法艺术付出了心血和汗水，也得到了丰厚的回报。他从没忘记小学时的启蒙老师王正元先生，王老师非常勤奋，一个人教一所初级小学，还有学前班，那时叫半年级。每天午饭后，王老师从不休息，总是在走廊上摆张课桌，为三四年级学生题写大楷。他在每一页大楷本的最上边认真地题写一行，让学生在下面临摹。半年级的小苏波总是挤到最前边看老师写字。王老师一边写一边讲：“点要像桃、撇要像刀”。他至今记忆犹新。王正元老师已年逾八旬，但身体还很健朗。苏波虽然不能经常去看望，但心里时常惦记着他的启蒙老师。说来也巧，上中学时又恰逢书法写得最好的王蕴珊老师带语文，每天一页大楷，又是一位很认真的老师。在这位老师的精心培育下，他学到了书写时的运笔、运气、藏锋、露锋、中锋、偏锋、方笔、圆笔、间架结构等等。在全国书法比赛中名列第二。以后又向当地书画名流求教，如天水市书协主席万惠民先生，文化馆长屈德洲先生、副馆长杜廷樞先生、文联主席陈冠英先生、天水诗书画研究院院长董晴也先生等等。

由于他的勤奋和坚毅，书法艺术日见长进，在全国书法大赛中屡屡获奖。佳作奖、优秀奖、创作奖、荣誉奖、华表奖、金杯奖、国家二等奖、国际三等奖、国际金奖、香港“世界学术贡献奖”、德国“中欧文化特使奖”等等不计其数。1986年进入中国书画函授大学深造三年，在两大教授刘炳森、欧阳中石、王遐举、赵嘉燕、姚俊卿等中国当代名流的指导下，书法作品日新月异。努力探索书写时的抑扬顿挫，计白布黑，节奏韵味，神采妙趣，章法布局等高境界的追求。

早在1976年底，光阴迫使他斗胆上街卖字画，开始时用最便宜的笔墨纸砚，每张字画成本5分钱，他竟然卖到1毛3分一张，当时觉得利太重了，决心要好好弹这根弦，没想到至今已弹了三十多年，而且越弹越响。收入越来越高，写字的劲头也越来越足。他在家乡卖了十多年，价位由每张1毛3分钱涨到每张5元。后来偶然听到在深圳每张字画可以买到10元，他便立即行动，背起文房四宝斗胆只身向神秘的深圳去了。在深圳每幅字画果真能卖10元，他惊呆了！钱怎么这样好赚呀？成本不足1元，卖10元，赚9元。有时还能卖到一百，甚至一千，一万。他曾看过《牧马人》的电影，贫穷的主人公终于挣了大把的钱，老婆怎么也数不清。他便想，我何时也能挣大把的钱，让我老婆也数不过来，那该都好啊！真没想到从深圳回家时坐着波音飞机，当把钱交给老婆时，她居然真的数不清，他太高兴了。在深圳一干就是十个年头，为深圳电视剧《特区少年》题写了片名，在香港《大公报》和《东方日报》发表书法作品多次，为深圳、广州和港澳台书写巨幅招牌上百家。于1997年在香港出版了本人大型书法专著《苏波墨迹》一至二卷，两年便畅销一空。当时有位姓刘的画廊老板以月薪三万另加提成聘请他常年在画廊写书法，不料他却淡然一笑，拂袖而去。回到老家，又写了三本书稿，斗胆去北京找出版社，没想到三本书稿全部过关，于是《苏波墨迹》三至五卷在北京面世了。

在北京，他为很多高层人物题写书画，应邀为北京大学题写条幅四百余幅，为驻华使馆、星级酒店、新华社、中央电视台、全国妇联等书写字画多幅。还为最高人民法院及院长肖扬先生书写条幅。2002年10月，应邀携夫人张桂梅出席了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的“海外华人与社会各界知名人士国庆座谈会”，受到多位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同年，他的书法作品荣获国家权威机构颁发的ISO资质与ISE价质双认证，每平方尺审定为360元，与市场价位基本吻合。

2004年7月，应邀参加“中国文化艺术交流访问团”赴欧洲九国观光考察，并在德国成功举办了《中国文化艺术展》，苏波先生的展展作品全部高价售出，又饮酒挥毫，现场书写十多幅。他是参展人员中销售最好的。喜欢游览的苏波先生，乘坐空中客车，飞越了广阔的俄罗斯领空，鸟瞰了欧洲的万水千山；他登上了埃菲尔铁塔，一览巴黎全景，参观了艺术圣殿“卢浮宫”，瞻仰了宗教教堂“巴黎圣母院”，象征胜利的“凯旋门”，深不可测的“卢森堡大峡谷”，令人仰慕的奥地利“马克思故居”，著名的“雨果酒店”，世界定级画家莫奈、凡高、毕加索的原作，迷人的“蒙娜丽莎画像”，美丽的“维纳斯雕像”，高贵的女皇塑像耸立在维也纳广场中央，宜人的意大利“威尼斯海滨”，挺拔的“圣马力诺城堡”，秀珍小国梵蒂冈竟拥有“世界最大的教堂”。苏波先生从小就有出国梦想，今天终于梦想成真了。

同年9月底，应邀出席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第三届中华杰出人物与海外华人华侨国庆座谈会暨中秋联谊会”，受到国家领导人的接见与合影，现场挥毫疾书，销售亦可观。特别是在联谊会上，应萨达姆表妹之邀，携手登台，起舞联欢，全场掌声雷动，节目主持人特别提出赞扬。

苏波是伏佐锋先生的字，其号曰墨龙，诗人，书法家，中国书法协会甘肃分会会员，东方书画研究院副院长，东方美术研究院书法部客座教授，中国书画研究会会员，中国青少年书协徐州分会理事，香港华人企业家杂志社书画事务特派员，加拿大书画世协首批会员，香港皇室科学院荣誉博士。

他的书法作品及传略载入《国际现代书法集》，《中华人物辞海》等十多种大型辞书中。他的《墨龙轩》画廊有各种精品销售，还可以现场创作，并有大型书法专著《苏波墨迹》三至五卷签名销售。

欢迎新老朋友光临选购，外地客户可来电邮购。

苏波先生被聘为美国北美第一开发集团上海代表处北京联络部主任。欢迎急需资金的大中型企事业单位与苏波联络，可引进美国的资金。